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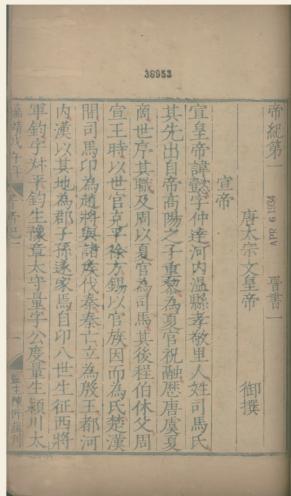


文華書潮

二零二一年 第二期

武汉大学图书馆

武漢大學圖書館珍貴古籍選介（二十八）



晋书

晋書一百三十卷，唐房玄齡等撰，音義三卷，唐何超撰，元刻明正德十年（1515）司禮監嘉靖萬歷南京國子監遞修本。

是書記載了從司馬懿開始到晉恭帝元熙二年（420）止，包括西晉和東晉的歷史，并用“載記”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國割據政權的興亡，含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是書內容甚為詳洽，彌補了《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已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唐书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等撰，元大德九年（1305）建康路儒學刻明成化弘治嘉靖南京國子監遞修本。

是書又稱《新唐書》，記載了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唐朝興衰的歷史，含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是書較《舊唐書》新增了《儀衛志》、《選舉志》、《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已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浣溪沙

余自辛酉秋入读珞珈，不觉四十年整

王新才 教授 馆长

忆入珈山负笈游，
桂香乍放火初流，
数来四十一年秋。

因醉金风因病酒，
渐灰心事渐霜头。
向无人处独登楼。



亲爱的图书馆

◎ 王 媛（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我最近刚读完的一本书，书名就叫《亲爱的图书馆》。最早知道这本书，是因为听了邓咏秋师姐转述的罗丽丽师姐的推荐：“我看另外一本关于公共图书馆历史的书，Susan Orlean 写的 The Library Book，主线是关于洛杉矶图书馆 1986 年那场大火的前前后后，同时也娓娓道来洛杉矶图书馆 100 多年来的发展史，很形象很细致地为大家铺陈了一幅图书馆变迁的画卷。”当得知 The Library Book 出现中文版之后，我就赶紧入手了。不得不说，中文版书名改为《亲爱的图书馆》真是妙，The Library Book 更像是一本工具书的名字，而《亲爱的图书馆》就像是一封情书了。

1986 年 4 月 29 日上午，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发生了一场火灾。七个半小时后，火才被完全扑灭，四十万本书被烧毁，七十万本书被损坏。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图书馆火灾事件，却迟迟没找到真凶。三十年后，《纽约客》专职作家苏珊·奥尔琳在陪孩子到图书馆做采访时偶然得知此事，她重拾对图书馆的回忆和情感，花费七年调查和创作出《亲爱的图书馆》一书，这既是一本火灾调查的报告文学，也是一本描绘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史的历史画卷。我读这本书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幽默与深情，以及高超的资料挖掘与文字驾驭能力。阅读时，我不停地点头称是，不停地哈哈大笑，并忍不住在朋友圈分享书摘：

“我是在图书馆里长大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从我还很小的时候开始，每周都会跟妈妈一起去好几次图书馆。……我们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对我而言永远都不够长，因为这地方实在太丰富了。……每次造访都向我承诺：我离开时比抵达时更富有了。……离开一个不用付钱就能拿到东西的地方实在令我兴奋，很快就能读到的新书也令我激动不已。……妈妈总是会说出同样的话：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任一职业来相伴终生的话，那她肯定会选择当一名图书馆馆员。”（第 1 章，8-10 页）

“他（卢米斯）认为自己应该为读者的智力和健康负责。大量伪科学图书的流行令他十分担忧，他认为‘用火柴烧了它们都嫌浪费火柴’。不过，他并没有真的将这些书从藏书目录中删掉，而是建立了他所谓的‘纯净文学食品法令’，以此提醒读者注意这类书。他雇铁匠做了一个可以印出骷髅和骨头十字交叉图样的烙铁——这是警告“此物剧毒”的化学符号——并把





其图印在所有违规书籍的封面上。除此之外，他还制作了专门的警告卡，插在可疑图书中。原本希望在卡片上印着：‘这本书是我们馆藏中最差的一本。很抱歉，您的判断力实在太差，因此也只配读这本书。’但他最终还是被馆员说服，用更加克制的语气告诫读者。”（第 13 章，160 页）

《亲爱的图书馆》这本书让我再次想到了 2020 年读者吴桂春先生写给东莞图书馆的离别感言。他临别时写出了如恋人离别时（李东来馆长接受《新闻 1+1》访问语）的真挚情感：

“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农民工。”

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有一座免费的公共图书馆依然很重要？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互联网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真正填平信息鸿沟，从某种程度而言，信息鸿沟比以往更大了。人们与优质信息的距离，原来只差一本 20 块钱的书的距离，而现在差了一个至少 1000 元的智能手机以及每月产生的网络通讯费用。比起只要认字，拿起一本书就能读而言，互联网上信息的查找也是信息鸿沟的一部分，大部分人只能自己摸索或者等着被各种媒体投喂。而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鸿沟带来的差距。因经济状况不佳造成的知识贫困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普遍，脱贫攻坚中不能忽略信息脱贫。

建筑、网络、电、人员、书籍、资源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但到了公共图书馆，这一切对公众都是免费的。投资在公共图书馆，这既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是回报率很高的事。有了图书馆，公众的信息需求、学习需求、社交需求……都有了部分或全部的寄托，有了进一步向好、提升的可能。可以说，投资图书馆，就是在投资一座城市、一个社区的未来。

2016 年前后，我曾在清华大学一门课程中主持过一个研讨型小组《图书馆即大学》，带学生先后走访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多个图书馆。我告诉学生一个秘密，如果你新到一座城市，有时间就去看一看她的图书馆，城市的实力、眼界、底子、气质……在她的图书馆里一览无余。

《亲爱的图书馆》中有很多内容来回答“图书馆很重要”这个问题，而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中国的图书馆界也有很多。我曾建议邓咏秋师姐策划出版一本中国图书馆界的温暖故事集，现在看来，我们的确不缺故事，但缺讲故事的好手。我猜苏珊·奥尔琳讲故事的能力与她从小在亲爱的图书馆中长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开 卷】

亲爱的图书馆 /王 媛

【回眸·眺望】武汉大学第十届书评影评大赛优秀作品选登

我站在拂晓呼唤挽歌

——张艺谋《悬崖之上》 /葛艺婷 2

回望岁月匆匆，举目青春葱葱

——徐蓓《九零后》 /徐舒彤 6

“骗局”亦暖，山河共情

——宁浩《我和我的家乡》 /褚燕开 10

踏平坎坷成大道，越是艰险越向前

——张永新《觉醒年代》 /刘梅珊 13

痛快地唱起关于生命的歌

——路遥《平凡的世界》 /杨戈蕊 16

青春作伴好读书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赵 虎 19

秋之白华，一生独伊

——霍建起《秋之白华》 /张邓楠 22

摄影有力量，影像有担当

——李舸《武汉，9秒66天》 /林琦桁 25





【专 栏】

人间美词·日晚倦梳头 /王新才 28

【书 评】

读《迦陵论词丛稿》 /刘沛恺 44

诚挚的情和诗意的美 /毛本栋 55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刘学正 60

【连 载】

公书林琐闻（续二十六） /王子舟 63

【图 讯】

百年辉煌 以阅读献礼

——第九届武汉大学读书节 / 68

将古籍保护好 让文献活起来

——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揭牌 / 76

传承经典 存亡继绝

——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与研究成果概览 / 81

武汉大学第十届书评影评大赛 获奖作品选登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岁华诞，悠悠党史中，是传承千载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经验与实践方向。

1921到2021，岁月流转，沧桑巨变。破开风雪走来，我们躬耕人生沃土，也谱就历史篇章。一路烈火淬炼，我们无惧罡风自有风骨。

透过文字和光影，我们看见百年间无数质朴的抉择、热血的呐喊、纯粹的笑泪，直白又含蓄、真实又浪漫、震撼而直击心灵。

建党至今有多少动人的故事、优秀的作品曾触动你心？眺望的远方又是何模样？

由武汉大学图书馆、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联合主办，武汉大学青年发展咨询与服务中心承办的武汉大学第十届书评影评大赛，以“回眸·眺望”为主题，面向全校师生征文，历时月余，征得诸多优秀稿件，现选登部分与读者一同品味。





我站在拂晓呼唤挽歌

——张艺谋《悬崖之上》

◎ 葛艺婷（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2020 级本科生）

我是见过落雪的奉天城的——那是像烟灰一样的细雪，呼啸着席卷过火车站的钟声。曾经日占、如今的沈阳市火车站，依然在繁华中忙碌着，魁梧、巍然、肃穆。它脚底下的交通网仍然像 122 年前竣工之初那样呈散射的日光状排布，烙印着日本想要“普照”东亚的野心。在东北三省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没有无端的热血、无端的仇恨，只是残存着生根在这里，也终将皈依于此的，操持着浓重东北腔、却有一口流利俄语亦或是日语的老人。

回望影片这样炽痛的历史背景，面对热映档期的《悬崖之上》，我是无谓它所自带的标签的。所谓谍战、悬疑，以及其与生俱来的争议，在面对这样一个粗粝质朴的故事时都未免显得太过穿凿。



这是一个留苏潜伏小队执行秘密行动，试图寻找从日军绝密监牢越狱成功的证人的故事，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让证人站上军事法庭，对惨无人道的罪行进行彰示正道的指认——行动被命名为“乌特拉”。乌特拉的营救对象王子阳确有其人，这是一场历史照进现实的映射。曾经的王子阳从日军 731 毒气实验室脱狱，一路风餐露宿、死里逃生，瘦到皮包骨头、磕碰头破血流，最终仍然牺牲在东北抗联的战场上。

这不是草蛇灰线、匠气机巧的解密悬疑，而是悲壮的、粗犷的、原始的铁血对抗。而正是因此，这个故事的讲述不需太多的出乎意料，也没有通俗的大快人心；主角没有全知全能的升维预料，也没有高歌着信仰的壮烈牺牲。多数时候，人物的行动往往是出于直觉和本能，英雄的逝去往往显得苟延残喘、象征意义匮乏。但这绝非一种缺陷，反而是对真实往事撰书作传的致敬：就是在面对那样粗陋的联络维度、就是置身信息黑箱的无望，死亡的审判就是顷刻倾泻而下，没有人来得及壮烈、来得及高呼理想，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在炮烙中首丘而死，骨骼粉碎、血肉砾泥，然后用滚烫的一腔热血染红了苍茫的雪原，捧起了一个破晓的黎明。

对于这个聚焦于伪满政权的取材议题，我有着天然的偏袒。这是一块近期在逐渐拓荒的、亟需讨论的灰色领域，连着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血缘脐带日益饱满鼓胀。日伪军穷凶极恶、草菅人命，信仰、尊严连带着自己项上的人头一起待价而沽，但他们又确实是与我们一同脱胎于这片土地的同胞，有曾分享同一个乳房的娘。对于在冰天雪地中蹒跚前行的共产党，他们恨吗？他们是没有恨的，只有一种出于侥幸的“蔑视”，难以自持的畏惧，还有对那种坚定、那种追寻、那种无谓的艳羡。这种人性的矛盾是贯穿全片的，也延续着我们烽烟中的百年。正如科长最终虽然对周乙的身份起疑，但仍把内鬼追查结下——或许他只是想混口饭吃，也或许卑劣的人不敢经受滚沸的考验奔赴光明，因此欺骗自己隐匿于黑暗偷生，却在隐秘地渴求被正义终结。

融泥一般的黑，飞雪一般的白，呼啸着从斯大林格勒吹来又掠





过大兴安岭的落山风，一望无际的林海半空绽开四朵伞花，在罡风中完成信仰的纵身一跃。张艺谋导演似乎已经在有意识地淡化他最富特色的光影哲学，而走向了象征主义的暗喻。全片人物的着装无他，全部是黑色呢子大衣：这是东北冬季最实用的穿搭单品，厚实、板正、抗风；全片的天气背景无他，斜飘的雪、纷飞的雪、洋洋洒洒的雪和广袤的雪原——这造成了在观影初期，连认脸都是困难的，更何况除了六个主角以外，其他人甚至没有名字。在这种琢磨下，每个人都被一刀削弱了——导演悲悯地使用大量俯拍镜头，喃喃宣告，你们都是一样的、时代的蝼蚁。黑色的大衣是内忧外患的毒疮、是日伪满洲国明面的屠戮与统治；白色的雪是方寸天地间弥漫的白色恐怖，无处可逃，就连呼吸都痛彻肺腑。在空降后，小分队的成员们满衣是雪、如被掩埋，暗示着他们正保持潜伏；在亚细亚故事段，雪落在英雄的帽檐、肩头，而他们潇洒地时不时拂拭，以示不屈而顽强的抵抗。



全片唯一一个雪雾的镜头，就是影片的最后五分钟。你送我离开，在郊外的白桦林。此时并肩的四个人只剩下一个，我看着白日、看着青空，偏偏没看到我一直期盼的破晓。我问，那些先走一步的战士怎样离开，你说，他们战斗至最后一刻，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

了自己。你要走了我用来自我了结的白色药片，没告诉我有人至死也不愿奴颜婢膝跪在刑场上，有人被手指搅拌口舌直至失去意识，而你自己送走了你潜伏中唯一的单线联络人。我未曾知道，他们曾在敌人面前自信地高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未曾知道，等待拂晓的那片浓稠的黑夜里、升起炉烟的瓦房村屯间，有谁流落的孩子。等待天亮，我依旧等待着，等待守望百年。而你温和地走进了那个良夜，雪再次飘起，你走进那黎明前最暗沉的混沌中。

手风琴编织着片尾曲的前奏响起，歌者周深唱起挽歌，唱起一种哀悼、追思、或是雄起。

这是为了胜利必须修筑的墓碑。唱有信仰的孩子乌黑的头发、心上人冻僵的心房；唱你离开的村庄、黑鸦鸦一片呼啦啦的鸟冲着工厂冒出的白色烟圈冲去、翅膀戳进云霄；唱冬夜漫长的北方、漫长的边境线；唱先烈守望的黎明。

乌特拉，那是“破晓”，是百年烽烟里，你我一点点见证、一点点熔炼的复兴，是信仰风吹雪融，国家睁开眼睛。

《悬崖之上》张艺谋导演，2021年上映

上世纪三十年代，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从跳伞降落的第一刻起，就已置身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同志能否脱身，任务能否完成，雪一直下，立于“悬崖之上”的行动小组面临严峻考验。





回望岁月匆匆，举目青春葱葱

——徐蓓《九零后》

◎ 徐舒彤（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2019 级本科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从末世危局中应运而生，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解救出来，引领中国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奔赴光明的未来。这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在我们看来，也许只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而对于一批特殊的“九零后”而言，这却是他们一往无前的青春。

故土在战争中沦陷，母校被炮火摧毁，满目国破山河，满耳哀鸣阵阵。一群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背负着行囊，怀揣着热血，他们徒步南迁，穿越湘黔滇三省，最终在昆明组建的临时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大习生活，探求救国之路。纪录片在十六位平均年龄超过九十六岁的联大学子的叙述中缓缓展开。数十位特殊的“九零后”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带领观众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激情岁月，去感受属于他们的别样青春。



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
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到祖国

特殊的“九零后”还原峥嵘岁月

影片标题所指的“九零后”，并非指我们通常理解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人，而是指 16 位年过九十的联大学子。这 16 位联大学子都并非等闲之辈，他们虽然不是影视明星，却完全称得上“星光璀璨”：98 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100 岁的国际翻译大师许渊冲、101 岁的翻译家杨苡……这些“九零后”虽然已是垂垂老矣，然而在影片所呈现的岁月中，他们正值青春。

他们的青春注定不平凡。内忧外患的千里江山，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在影片中，巫宁坤先生用动情的讲述，对那段血色历史进行深度还原。巫先生从他的家乡开始谈起：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烟雨迷蒙的瘦西湖，古色古香的彩衣巷。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直到日军打破了一切。故土不再，山河飘零，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的青年学生们，聚集在小礼堂里，满腔怒火化为一曲柔柔的《松花江上》，歌声回荡在厅堂，萦绕在人们心间。讲到这里，巫先生已然泣不成声，年近百旬的老人，哽着嗓子，对着镜头无力地挥舞着手臂。一双婆娑的泪眼，似乎是从几十年前穿过时间，越过屏幕，直照射到我的心坎里。那一刻，我感觉我仿佛也置身于拥挤的礼堂中，耳畔是哀婉的女高音，她在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我摸摸脸颊，手指触到一片温热的湿润，不知何时，泪已满眶。

评价式结构全面刻画人物

《九零后》的叙事结构不同寻常，相比近些年其他国产纪录片，它既不像《摇摇晃晃的人间》那样，以时间为轴，进行线性叙事；也不像《掬水月在手》那样，设置小标题作为叙事线索。纵观整部影片，乍看之下几乎难以察觉到它的叙事章法，却又觉得有一根无





形的线，将整部影片串联成浑然天成的一体。再三琢磨，才警觉它是以人物之间的评价作为连接的纽带：“九零后”们回望岁月，缅怀同学、师长，讲述留存在他们青春记忆中的人与事，数十段回忆交织重叠，还原出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这种独特的结构，跳脱出了传统叙事框架，使那些尘封在历史中的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鲜活明晰地出现在你的眼前。

在影片所讲述的众多节目中，邓稼先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我很早就了解邓先生的功绩，他是历史课本的常客，作为“两弹元勋”，他的单人照片和原子弹爆炸照片并列在同一页。“他一定是个坚毅、严肃、深谋远虑的人”，看着书上的照片，我曾经这样想。而在观看过影片后，通过杨振宁的讲述，我了解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邓稼先：在我印象里严肃的伟人，在同窗心中是长着娃娃脸的稚嫩少年，是最为 pure（纯真）最为热情的同窗，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是共读诗词的知音……

杨振宁在为邓稼先写的传记中动情地讲述道：“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曾经的稚嫩少年，带着纯粹真切的赤子之心，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担，永永远远地守护了神州大地。屏幕上的少年和我心中的老者逐渐重叠，又模糊在千千万万革命先辈的身影中，最终幻化成一片红色的海，模糊了我的双眼。



回望过去，“九零后”们用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时光匆匆，过去种种皆为陈迹，而举目远眺，我们这一辈的青春葱葱，奋斗正当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广大青年要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我们在路上！

《九零后》徐蓓导演，2021年上映

故土在战争中沦陷，大学被占领、被炸毁。一群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他们匆匆出发，徒步南迁，横穿湘黔滇，最终在昆明高原组建临时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大。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出演”，带你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年代。对这些今已年过九旬的“九零后”老人而言，西南联大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而是依然鲜活如初的青春记忆。





“骗局”亦暖，山河共情

——宁浩《我和我的家乡》

◎ 褚燕开（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2019 级本科生）

总有一个故事，是关于那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故乡。总有一段感情，永远存在于胸膛，不论何时何地，都会让我们热泪盈眶……这似乎是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温柔，又或是我们内心最脆弱的情感，它让我们春风满面，又让我们心潮澎湃……

《我和我的家乡》是一部由五个导演共同执导的关于“家乡”的主旋律电影，就故事情节来看，五个故事

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默契，那就是“骗”：张北京帮助表舅骗医保、黄大宝用自己的发明骗节目导演、一群学生骗老师上“最后一课”、改造家乡的乔树林骗大师姐、偷偷下乡的书记骗妻子……

但电影的主题并不是“骗”，而是情。是对人、对家乡、对祖国的感情。山河有情，骗局亦暖。骗局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领悟这份情，谎言中往往藏着我们最大的善和温柔。“骗”的背后，是每个中国人的细腻与温暖。“骗”的背后，是我们在看到亲人无法医治疾病时想方设法，即使放弃购买自己心爱的轿车，也要帮忙治病的感动；是心系家乡，制造飞行器改善家乡物流不畅的状况的情怯；是在老师失忆时联合起来，努力帮助他恢复记忆的感恩；是自己身无



分文，但也要捐赠二十万帮助家乡防风治沙的坚持；也是心系农村，放弃留学，亲自下乡的热忱。或许有时正是有了这些“骗局”，故事才可以那样的美丽动人，直击人心。

正是因为这样，这部电影没有以往主旋律电影的“说教之气”，而是寓教于乐，在欢声笑语中激发观众的家国情怀。“误会”、“骗局”，这是戏剧、电影情节中常用的一种手法，也是吸引观众的巧妙手段。在情节上，人物需要为实现一个骗局去付出很大的努力和很多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就是电影“娱乐性”的重要表现，这往往让我们捧腹大笑。比如《北京好人》中，张北京和表舅为了互换身份，制造很多荒诞闹剧；《神笔马亮》中，马亮为了不让老婆发现，维护骗局，用种种手段阻止妻子登上观景台，让人捧腹。但在笑声的背后，是一个个让人感动的故事内核，正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才使得我们笑中带泪，最大程度的激起我们的情绪，达到真情流露、进入影片的目的。

五段不同的小故事都采用这种笑中带泪的“骗局”形式，让我们沉浸其中。但在影像风格上都保留着不同导演的特色。

在《北京好人》中，宁浩导演荒诞、戏谑的风格体现得很明显。以一种调侃的风格展示“身份互换”，比如抽血时为了不被发现，张北京拿着表舅的手进行抽血。而从视听语言上来看，大部分用较暗的色调展示医院环境，配乐多为人声合唱，展示出有病无法医治的压抑情绪，直到最后张北京吹散一朵蒲公英的特色，影片色调才变得明亮，“治病”主题也达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天上掉下个 UFO》和《最后一课》在色彩上都以明丽的绿色、蓝色来展示黔南和千岛湖美景，沁人心脾，但徐峥的《最后一课》有所突破，在色彩上更为浓墨重彩。老师冒雨取颜料，摔倒后颜料被河水冲散无疑是经典镜头之一，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观众情绪就像色彩一样五味杂陈。还有最后当老师看到姜小峰把画中的学校建设得五彩斑斓，记忆也得以恢复。斑驳的光影加上让世界充满爱的配乐，使观众情绪达到高潮。而《回乡之路》的风格则呈现出一种公路片的即视感，整个故事都如其名，在回乡之路上展开。直到学校的小朋友在演讲中感





谢乔树林，故事的“骗局”才完满结束。在视觉上则以大片的土黄色和黄绿色展示陕北风光，进行前后对比。开心麻花团队的《神笔马亮》无疑保留着“沈氏幽默”的风格，是我认为在喜剧节奏上把握最好的，一个又一个包袱让人哭笑不得，最终“骗局”被揭露，回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结局。

五个各具特色的故事，指向一个共同的母题——家乡。从整个影片来看，影片很好地展示了家乡风貌，从儿化音浓厚的首都北京，到苍翠欲滴的黔南风光，山清水秀的千岛湖，再到一望无际的陕北风光，广阔无垠的东北土地，从视觉上给我们直观的冲击。除此之外，无论是影片的情节还是台词，都体现着家乡的发展变化。“贵州变化大，县县通高速，镇镇通公路，村村铺水泥路”弥补着“一公里之隔”的遗憾。千岛湖和马亮的茴香村发展起了旅游业，沙里沟已是漫山遍野的果树，不再受风沙侵袭……

家乡发展，离不开祖国强大。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已是沧海桑田，山乡巨变，万物生长。农村医保贯彻落实惠及人民，网红直播带货促进商品销售，交通、物流快速进步，旅游业也迅速发展，“智慧农业”也在逐步尝试，这都是影片中提及的。看完影片，除了对家乡的感情，就是对祖国强大繁荣的感慨，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在观影的笑中带泪中，我们就已潜移默化的产生了这种情感，这就已经证明了这部主旋律电影的成功。

《我和我的家乡》用五个“骗局”，展示国人内心的善与温柔；五个“骗局”，让无数观众捧腹大笑又潸然泪下；五个“骗局”，展示了北京、西南、南方、陕北、东北的家乡风貌；五个“骗局”，展现了家乡发展和祖国强大，唤起了每个国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骗局”亦暖，山河共情。望家乡更美，祖国更强。

《我和我的家乡》宁浩等导演，2020年上映

影片通过《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故事单元，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抒发人们的家国情怀，展示脱贫攻坚成果。

踏平坎坷成大道，越是艰险越向前

——张永新《觉醒年代》

◎ 刘梅珊（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9 级本科生）

都说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新闻，今人读起历史来始终隔着时代的蒙纱。犹记得中学阶段学历史，嘴里一遍遍念着时间地点人物原因影响意义，却不曾细想书本上简单的几行文字背后，是多少人的年华，是一番怎样的改天换地。

有幸《觉醒年代》将那一段波澜岁月带到我们面前，于演员、台词、场景、镜头转换中无不看到了剧组的用心和真诚。我曾寡陋无知，以为思想启蒙运动不过是写写文章读读书，最多到大街上吆喝两声以获取关注，未曾想，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更是一场硬仗，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要把旧社会的天空劈下一道口子，搅烂碾碎封建礼教三纲五常，让新鲜空气奔涌进来。推翻上千年的陋习文化，谈何容易！虽没有战场上的兵器厮杀，顷刻之间你死我活的物理伤害，但新旧文化交锋的激烈锐利，也掀起了人心中的惊涛骇浪。

《觉醒年代》并不只是将妇孺皆知的历史事实呈现出来，某某年谁发表了什么文章，某某年什么事件引起了何种后果，它细细勾勒了前因后果，将先辈们的所思所想、心路历程一步步地呈现出来。先生们并不是神算子，不是一开始





便知晓中国该往哪里走，他们从风雨中走来，在黑暗中摸索救国良方，虽不知何时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但始终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已经在路上了”。从“二十年不谈政治”、无政府主义到在实践调研中逐步证明的马克思主义，心中有疑虑困惑，遇到挫折争议，遇到过反对碰到过斗争，探索过程艰辛，但方向逐渐明朗清晰。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一切，称之为“历史的选择”，其实得来不容易，是先辈们前赴后继苦苦探寻的救命良方，他们看不见却选择了相信，因为他们相信而让我们得以看见。

在先生们为国家民族呕心沥血之外，他们的家庭琐碎、生活日常为历史增添了几分烟火气息，丰满了人物形象。仲甫先生怀抱白兔与孩子交谈，守常先生砌炕，蔡元培唱小曲，周树人嚣张宣示“不干了”……正因如此，剧中的人物真实、鲜活、有血有肉，人物形象立住了。越过教科书上单薄的照片和短短几行文字，我们看到先生们朴实生动的一面，他们会哭会笑会呼吸，能在雪中饮酒畅快大笑，也会生活窘迫揭不开锅。超脱于生活之上，坚定的信念，舍我其谁的气魄与担当让人相信，他们就是光的来处。

我一次次为先生们舍我其谁的担当所感动，为他们不屈的风骨所折服。我们站在后来者的视角回望那段艰辛岁月，心中已然知晓他们必将取得胜利，以上帝视角感知他们奋斗的意义，但他们是故事中人，面对的是混沌不清的未来。国人被腐朽文化裹挟，难以自拔，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土沦丧，当局腐败无能，软弱卖国。风雨飘摇之中，他们不清楚什么时候能赢，是不是真的能赢，全凭一腔热血，肩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他们的伟大和悲壮远比我们想象的浓烈得多。即便他们最早醒来，四下黑暗，看不见真切的未来，仍要选择相信，“大喊几声，能叫醒那几个人，就决不能说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要唤醒沉睡的民族之魂，扫除国民血液中的麻木冷漠，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接力奋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瞻前顾后畏缩不前的妥协心理，蒙昧落后自私自利的思想作风，正是中国无法挺直腰板支起脊梁的祸根！

“不敢担当就是失职！就会遗祸子孙！我等，绝不能当作壁上观的局外人！”先辈们的话语振聋发聩。他们怀着必死的准备，奋起力争，只求民族觉醒国家独立，将苦难的中国人引向光明，九死而不悔。百年后的中国，民富国强，是先辈们留下的荣光照亮了前程。

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吾辈更需自强，继承先辈遗风，读书明理更要有家国情怀，关注国家发展，关心社会动态，生于斯长于斯，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再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担此重任，责无旁贷。虽千万人，吾往矣。

回看来时路，荆棘倒地，芳草悠悠，泥泞路上深深浅浅的脚印凝固定格在历史画卷上。永不会忘记，黑暗之时，是谁驱散眼前的迷雾，是谁以肉身之躯驮起民族希望，又是谁身先士卒，没来得及看见破晓的光就葬于永恒的寂静。他们引爆自己，炸起惊雷一响，抖去四万万国人俗性奴性，撑起了中国人的脊梁。日光和煦惠风和畅，我置身人群之中闭目，车辆疾驰而过的声响卷起路人远远近近的声语，他们眯眯眼在说，今天吃点什么好呢？

《觉醒年代》张永新导演，2021 年上映

本剧以 1915 年《青年杂志》问世到 1921 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痛快地唱起关于生命的歌

——路遥《平凡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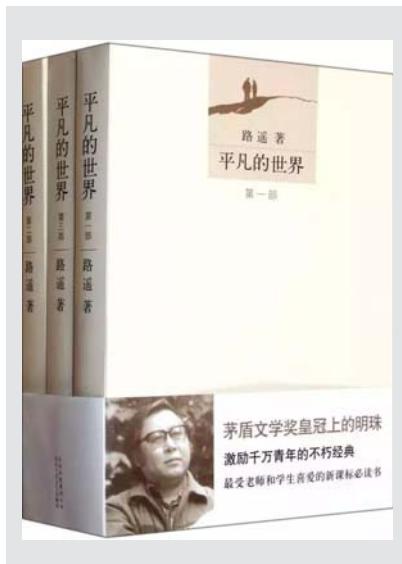
◎ 杨戈蕊（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9 级本科生）

《平凡的世界》，一支关于平凡的歌谣，但不是旋律平平的歌，是抑扬顿挫的生命之歌。我展开故事，抚摸着书页中关于他们的片段，仿佛就能触摸到他们皮肤上的棱角和褶皱。我可以听见他们的喘息，那是用力生活着的强烈气息，是猛烈跳动的砰砰心脏。

“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的海阔天空。”朴树的歌词在某个生命节点也礼赞

捶打过他的生命吧。数不清那些扎根在黄土高原的人们有多少次坠落沟壑，又有多少次想要爬上高地时被生活狠狠抛下去了。可是生命不同于等闲之物的一点就是，它坚韧而富有弹性，遍体鳞伤的痛楚让原本稚嫩的生命积累了内在的力量，让短暂的生命历程延续了无尽的韵律。正是由于那些黄土上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坠入沟壑而又爬上高地，我才能领略到黄土高原高低起伏、沟壑纵横的壮美，那里传来过生命的绝唱。

一棵幼苗，偏偏成长于干裂的土壤里，在它想要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时候，却汲取不到任何养分。它用力地伸展自己稚嫩的根，在贫瘠的土壤里寻找、吸取哪怕一点点水源，可力不从心。这就是孙



少平的成长环境啊！农活的忙碌不能容许少年有足够时间去满足求知欲，清汤寡水、总是没有着落的午餐又怎能喂饱少年的体魄？可是呢，阳光会驱散阴翳和成长的烦恼，也会告诉少年海阔天空的精彩。就像他在苦闷中偶然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巨大的震撼让他对生命肃然起敬，让他心无旁骛地去昂扬生长。我们不一定能够生来就坐拥肥沃的土壤，但是可以均等受到阳光的眷顾。这一束阳光，或是没有获取门槛的知识，或是隐隐影响我的榜样，他们让生命获得了由内而外的力量。谁能理解孙少平一腔热血地走向大城市，却甘愿一头钻进了不见天日的煤矿里呢？不止如此，谁又能解释这位煤矿小工含着一天的疲乏将夜间珍贵的睡眠时间用来读报呢？这很矛盾。他到底是向往着富足的生活还是充实的内心呢？但这又不矛盾。别忘了生命是复杂的，他是自由的，煤矿工作带来的重压让他为自己的旺盛精力而欣喜，短暂的知识汲取让他为头顶上的那片广阔世界而饱含激情。我们不能选择永远地一帆风顺下去，但我们可以选择头也不回地走下去。

如果说，我们会为孙少平破土而出的力量感到振奋，那一定也会为他的哥哥深扎土壤的坚守感到敬畏。理性的背后是成倍的酸楚和割舍。我们常说“诗酒趁年华”，和田润叶展翅高飞本是一个年轻人可以放肆选择的浪漫情节。但是如果选择和她组成一双蝴蝶翩翩起舞，在这片风沙大作的土地上，只会被风卷起，又狠狠摔在地上。“梁祝”的故事固然美丽，但令人惋惜。作为家里的长子，在生下来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背负着半个家庭的负担。柴米油盐将他牢牢束缚在这一方穷山恶水之地了——难道就要山穷水尽了吗？未必。他不能自由地像弟弟那样放心去大城市闯荡，不能远走他乡，难道就不能向上爬了吗？他身强体壮，拼命地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夜耕作让他成为了一名实实在在的农民。可是他也很纳闷呀！这么一大块土地上可以结出这么多粮食，为什么就是养不活家里这几口人呢？他看到邻村包产到户带来的甜头，努力向上级争取制度变革；他瞄到建造砖窑的财富机遇，赔上所有家产孤注一掷。他成也黄土，败也黄土。他每天琢磨的都是脚下的这一方土地，无论被上级打压、





经历砖窑破产，他早已把心放在了这片土地上。他时常在夜里被满目疮痍的生活叫醒，告诉他或许这次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可是又能怎样呢？逃离双水村，一走了之？或是装聋作哑，被动等死？漫漫长夜里，他望着看不到底的天空，就把所有苦闷都交给黑夜好了，因为天明时还要用饱满的精神去带领老少继续生活呀。他未曾不羡慕弟弟可以没有负担的去闯荡，但是负担会让生命变得更加有厚度，会让悲壮的声音传递出绵延不绝的力量！

原本以为只要坚定地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就可以得到这个世界馈赠给我们的“浪漫主义”情节。可是生命中有些顺理成章的美好只能称作“惊喜”，而非“常态”，起起落落才是真实的生活。当不可抹去的阴霾已经注定会成为我们命运的缺憾时，唯有始终抱有对未来的某种特别的期待，才是真正的救赎。因为当我们仍然对生活抱有期待，我们便没有妥协，生命的长河就依然在延续。我相信命运有时会被打击到头破血流，但永不至于会到无能为力的地步！人类从诞生到现在繁衍昌盛便是这个道理呀。不如就痛痛快快地唱起生命之歌吧！

《平凡的世界》路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

作者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在小说中全景式地表现了中国当代城乡的社会生活。在近十年的广阔背景下，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青春作伴好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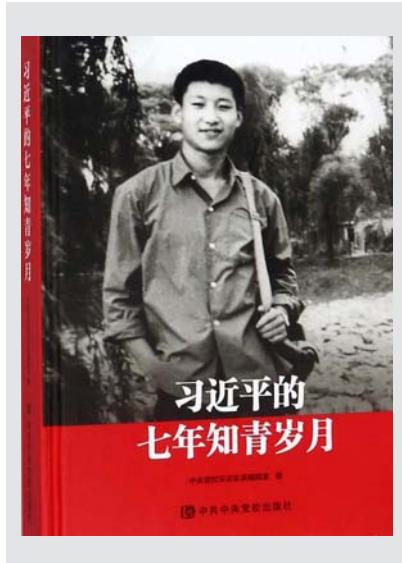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 赵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级博士生）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讲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当知青，在陕北高原上“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书中不仅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也通过一系列真实的细节与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作为青年在大好青春里应该具有的品质。书中传递的信息告诉我们：读书，正是青春最好的精神姿态。

青春不是天然地带有荣誉与桂冠，却充满着无限活力。尽管偶尔会感到迷茫，但只要找到方向，就应奋力前行。青春最好的伙伴，正是书籍。酷爱读书，是书中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谈到的对青年习近平的印象，也是作为读者的我几乎可以确定的第一印象。五十多年前，那个十五岁的小伙子，怀揣鸿鹄之志，离开学校，来到陕北农村，依然求知若渴，没有放弃阅读、思考。青春作伴好读书，这正符合我想象的样子。

读书是青春最大的乐趣。习近平痴迷读书。到陕北插队时，他只带了两个行李箱，而里面装的全是书，“有哲学的、政治的、经济





的，还有许多国外名著”。此后“白天劳动、晚上看书”成为他知青岁月的生活常态。用梁家河老乡的话说，“习近平读书有‘书瘾’”，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黄土高原上的生活艰苦异常，每日劳作之后，没有娱乐项目，偶尔也会组织对唱山歌。但在进门是黑漆漆的窑洞、出门是一望无垠的黄土的条件下，唯有读书才能让人暂时忘却苦难，坚持下去。很显然，读书就是习近平最大的乐趣。“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常常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这样的画面，放在任何时代，不都可以让人乐在其中，有滋有味么？

青春应该努力读书，求知上进。来到梁家河以后，虽然有各种劳作和活动，但也有闲暇时间。同龄的人都出去玩耍了，只有习近平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踏实实、静下心来读书。少时胸有大志，还需配以强大的自律品格。青年习近平的这种强大的自控力，与他的求知欲和上进心结合，使他能够更快地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为自身的成长筑起了基础。青春正是张扬个性的时刻，但不放纵的青春才更为难得。对于年轻的习近平来说，青春的大好年华就应该努力读书、求知上进，就应该积蓄能量，绝不虚度。

青春里要读书，要深入思考，以启智慧。古语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读书不仅是读书中的思想，读书之人也应有自己的思考；同时从书籍中汲取知识，辅之以生活实践的经验。如此读书，总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惊喜。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习近平“经常是几本书同时看，有所对比，有所分析”，“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注重从实践中求真知，指出“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习近平看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习近平和同伴们从头到尾认真地阅读了这部书，但阅读并不限于简单地了解历史，丰富知识。习近平在对历史的认知中，认真思考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近代，在吸收古人治国的经验智慧的同时深刻理解现实。就这样独立系统思考、反复

推敲、结合实践的读书过程中，他未来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就这样有了最初的积淀。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电子产品之间游走的各类媒体资讯正侵扰着纸质阅读的空间与时间，拿着手机时，每天的阅读已变得低效、碎片、浅尝辄止。这是知识的进步，却也是知识的退步。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静心读书，用心积淀。从知青到领袖，《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呈现的习近平的读书经历无疑给当下青年的阅读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也是爱书之人，爱买书藏书，更爱读书。从孔子到鲁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都留下了我阅读的足迹。在我看来，博文并思考，比精读而强记更令人心旷神怡。倒不是说阅读习惯影响思维方式，只不过是经常性的会有三日不读书如心上蒙尘之感。也许我并不一定完全记住了每一本书的具体内容，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书中传达的每一个道理，都将促使我朝着更加“善”的方向前进。因为好的书鼓励、指引着我，让我更加理性地应对这个变化的世界。

韶华不为少年留，青春做伴好读书。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总结道，“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成长总离不开经验的指导与启发，读书更是成长中推动前行的不二良方。读罢《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掩卷而思，新时代的青年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读书呢？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7 年版

196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 15 岁时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直至 1975 年 10 月。这组采访实录共采访了 29 人，其中既有同他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又有同他朝夕相处的当地村民，还有当年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这些受访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用真实的历史细节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





秋之白华，一生独伊

——霍建起《秋之白华》

◎ 张邓楠（武汉大学健康学院 2020 级本科生）

初遇时，他从黑暗的彼端走来，温润而优雅，可开口，却是唤醒时代激流的话语：“多年来，帝国主义霸占中国领土，操作中国政治，掌握中国经济，中国贫弱而沦于危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他语调并不激昂，亦不愤慨，但仿若已看透了往昔的腐朽与未来的曙光，站在那里，好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懵懂又热血的她。

之后，她回到宿舍，同住的小姑娘说“你身上有香烟的味道，是革命的味道。”

杨之华与瞿秋白的相遇，是彼此人生当中的一场意外，那时的之华，美丽、智慧、勇敢，面对祖国的江河动荡，从萧山奔赴上海，去做那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救国人。她说“选择了一种道路，就选择了一种人生。”杨之华，于芳华之年选择了一条充满着艰难险阻的道路，本以为自己会在这条路上踽踽独行，可她没想到，在万千道路中，有那么一条路，如天外来物般与她的路所相汇合，路的那头，站着瞿秋白。



波涛汹涌的乱世中，他们相遇了，他们在上海工人中开办夜校，一面扫盲一面宣传革命思想，他们共同参与党发起的“五月一周”学生运动，参加上海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矛盾、冲突、叛变，鲜血，但他们始终站在反帝反封的最前线，与此同时，爱的格桑花，也不知不觉悄然绽放。

那晚，她又回到宿舍，同住的小姑娘说：“你身上有香烟的味道，是爱情的味道。”

在他们相守的岁月中，瞿秋白曾送给了杨之华一枚珍贵的印章，对她说“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秋白，春华，他们相约共同用生命与鲜血，守护着他们生命的伴侣，守望这片逐渐燃起星星之火的燎原。

犹记初初结为伉俪时，瞿秋白有一句台词“我们已经看到了开始，或许看不到结局”。不错，这是他们携手共度余生的开始，可他深知，乱世之中，今昔一别，或许就为永恒。可我觉得，他更想说，这只是革命的开始。瞿秋白和杨之华，作为先进的革命斗士，站在了革命斗争的起始点，他们看见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觉醒，越来越多的腐朽终将消灭，他们共同书写的史诗中的第一章，也预言了结局的春暖花开，海生明月。可这结局，他们或许为之奋斗一生也无法目睹，或许为之奋斗，至一生。

终究，影片的最后，瞿秋白站在了漫天花海中，从容而温雅的开口“此地甚好，开枪吧。”这个结局，是他早已想到的，饮弹洒血，从容离去。他定有许多眷恋与不舍，因为在家中，是他相依相守的卿卿，是年幼懵懂的女儿，是身后还未完成的大业，是万千还在沉睡的国人。可他还是选择走了，宁死不降。因为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正是这条路，决定了他革命的人生。

何其有幸啊，他在这条路上遇到了挚爱一生的伴侣。更何其有幸，他知道，在他倒下之后，会有后继者，仍旧不惧荆棘与坎坷，于无畏中向前。这或许，就是那份从容的缘由吧。

回眸，瞿秋白已终其一生，为革命事业，无怨无悔地奔走、眺望。路的尽头，是隔夜的黎明，是恢弘的曙光。瞿秋白，从黑暗中





走来，而他自己，就是一束燃烧自己，照亮黑夜的火。而杨之华，直至与丈夫分别的最后一面，仍是那么的勇敢隐忍，她是知道的，或许自己眼泪，会使得丈夫动摇与担心。而之华，只想成为他奋斗征程的旅人，而不是前行道路外的烦恼。最后，面对爱人的最终的离去，她对母亲说“我不能不工作，秋白会生气的。”是何等智慧，何等勇敢，何等坚忍。

故事发生在风起云涌的乱世，热血激昂的战斗场面却少之又少。有的，是江南水乡的清净恬淡，是漫天大雪中的温柔对望，是长桥上的斜日夕阳，是静谧的校园中，他和她一同走过的楼梯小巷。就连最后，瞿秋白的离去，也是穿着妻子亲手缝的衣物，哼着英文歌，从容倒下，仿若是在诗般花海中的长眠。每次的离别之秋，都是那么的平静，但却，足以让人热泪盈眶。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这是瞿秋白和杨之华相知相守的原因，也是千千万万革命斗士、共产党人走在一起的原因。他们开创了这伟业的开头，也于风波中眺望着未来盛世的曙光。而我们，正代表他们，目睹着他们未曾看到的，这场电影真正的结局。看呐，这伟岸中华，这泱泱华夏，这恢弘盛世，正如你们所愿。



瞿秋白与杨之华合影

《秋之白华》霍建起导演，2011年上映

影片以传奇革命情侣瞿秋白和杨之华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为切入点，表现了一位儒雅从容的书生领袖与一位快意恩仇的巾帼英杰，以历久弥笃的坚定信仰所成就的一段超凡脱俗的红色情缘。

摄影有力量，影像有担当

——李舸《武汉，9秒66天》

◎ 林琦桁（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 级本科生）

摄影的意义在于什么？

举着相机按快门近五年，我仍没有答案。

影像需要震撼人心，这个道理早就知道。但《武汉，9秒66天》让我第一次如此感同身受地贴近影像的力量。原来，影像的力量并非虚无缥缈，而是触手可及。

于是答案有了，谜团解开了：摄影的意义在于记录，在于通过影像触及他人的生活，在于跨越时空传递情感和力量。

寒冬散尽，疫情的阴霾似乎已经远离。但逆着时间线回头看，时间轴上最黑暗最曲折的那一段，仍让人揪心。

这部小小的纪录片，导演李舸把 66 天的时光浓缩在这 123 张摄影作品、9 秒的曝光时间里。片头，声声号角响起，由远到近，由弱到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

庄严肃穆的交响乐响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熟悉又陌生的江城武汉：长江大桥下依旧江水滔滔，归元禅寺依然伫立，江汉关顶的旗帜一如既往地飘扬，但空无一人的街道、紧闭的店铺门窗，莫名的哀伤与凄凉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

昏黄调的黑白色影片，把武汉那最柔软又脆弱的一面剥开：病房里的呼吸机连着一个病床上小小的人，全副武装的医生在为他检查；一双手戴着白手套，颤抖着给棺材贴上漆黑的“祭”字；戴着口罩疲惫的奶奶，把小推车里的孙子裹得紧紧的，只露出一双眼睛……

最打动人心的，是数十张的护士医生面部特写：摘下口罩，脸上深深浅浅的口罩印，被防护服闷太久湿透的、粘着脸的头发，耐不住勒痕直接往脸上贴的创可贴……护士的脸大多很年轻，大不了





我们几岁，是爱做梦爱美的年纪。但是这场疫情把生命最脆弱的一面撕开，把血淋淋的人间悲剧摆在她们面前，这些姑娘们也顾不上其他，逆流而上，与死神一搏。

越往下看，会越认识到这不只是一部记录悲剧的血泪史，更是一部有力的抗争史。随着音乐由沉重悲悯变得激昂有力，画面由苍白的医院转移到生机的社区，看呐，援鄂医疗队挥挥手返回了故乡，大妈们戴着口罩在小区里重新跳起了舞，影院消杀准备重新开启……从生命“红区”到生活社区，从封城到解禁，从寒冬到开春，武汉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坚强抗争被李舸记录，浓缩在了这9秒中。

整部纪录片的最后，一抹彩色突然出现。高饱和度、明亮、清晰，几个年轻人举着横幅：武汉人，不服输。一抹阳光侧打在年轻人的脸上，点亮了他们手中的花。之前的黑白、惨痛、冷寂、无助在这抹色彩中消散，更激烈的情感爆发了，生的希望在观者胸中汇聚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这幅作品和整部纪录片一起，让观者再次体验了武汉从绝望到盼望，从冷寂到生机的过程。而贯穿这整个过程的，都融入在这短短六个字里。



这部作品更是对摄影时代意义的最佳诠释。

有多少人以为，摄影只是个人爱好，只能聚焦于生活中的美好细节？

不是的，摄影，让我们能够走进这些本是陌生人的生活，走进他们人生里不平凡的这一时刻。这9秒，让观者仿佛身临其境，仿佛处在那时武汉的方舱中，仿佛和医生病人们面对面，近距离感受

他们的欢喜与悲伤、绝望或希望。与文字不同，影像更直观、生动；与视频不同，影像更沉稳、宁静。这部作品最大限度发挥了影像的作用，安安静静地呈现，让你与图片中的人对视、拥抱、触摸他们的心跳。

这部作品还呈现了摄影的力量和使命感。是的，摄影可以记录生活中细小的美好，但摄影师更大的使命是聚焦生命的本真、用快门谱写诗歌、用快门记录历史。当李舸逆行返回武汉、走进方舱，每一次举起相机，他都满怀敬畏——拍下来、传下去，让外面的人看到英雄的武汉。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那样的严冬中，在那样的困难面前，按下快门更是一种仪式感和使命感，能够给予医护人员以力量。给医护人员提供一个发泄口，用光影记录下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一种治愈，更是一种力量的凝聚与传递。

感谢这部作品，立意伟大但不疏离日常，平平静静地让每一位观众共情；感谢这群逆行的摄影人，让 4.2 万名援鄂医疗队的肖像，乃至全国的抗疫白衣天使撼人心魄的抗疫历程，被摄影所记录、被历史所牢记，并永远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上。

《武汉，9秒66天》李舸制作，2020年上映

中国摄协主席李舸用自己拍摄的 123 张照片做了一部短片，名为《武汉，9秒66天》。123，喻意武汉从 1 月 23 日开始，进入了一段艰苦卓绝的抗疫历程。这 123 张照片的曝光时长加起来大约只有 9 秒钟，而这短暂的几秒，记录了我们从寒冬中的恐慌到暖春下的淡定；从抢救生命的“红区”到隔离生活的社区；从聚焦 4.2 万余名医疗队员到面对上千万武汉市民。





日晚倦梳头

◎ 王新才（图书馆）

武陵春·春晚

李清照〔宋代〕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世说新语》记载，王戎丧子，悲不自胜，面对好友劝解，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陶庵梦忆》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生而为人，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人生而有情。而生涯百年三万六千日，虽不算长，其实也不算短，这漫长而又匆匆的人生如果无情不免如冬江一般枯淡，而正因有情才恰如春水一般奔腾。人之情常常需要一个附着处，因此那些情感丰沛之人往往移情于物，形成一些特殊的癖好，所谓不为无益，何遣有涯。情不深，癖不特。癖特固已不易，癖特而遇同好则属难能，癖特好同且结为夫妇无疑就弥足珍贵了。

赵明诚李清照便是这样一对夫妇。他们结缡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神宗继位以后的宋朝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他开启的新政导致了此后旷日持久的纷争，在他以后的每一位实际掌权人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拨乱反正。而所谓乱，就是上一位掌权人所推行的做法。这种情形就像在狭窄的小河中撑船，对于新手，贸然出

竿，船不易按河道行驶，往往回撞到河岸，而一番调整之后，船头又会撞向另一边。神宗之后的宋朝就是这样不停地左碰右撞，经高后、哲宗而传到年尚未足满十八岁的徽宗，由皇太后向氏垂帘。向太后应该有意纠偏，所以在新皇即位后即大赦天下，并在按惯例第二年改元时将年号定为建中靖国，试图持守中正，宁靖邦国，哲宗亲政后被贬的旧党如苏轼等渐获起复。

但向太后在改元后即于新正间辞世，徽宗亲政，次年改元崇宁（1102）。所谓崇宁，就是崇尚熙宁，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蔡京由此走向历史舞台中央，出任右相，元祐法遭焚，元祐党人也被一一登记在册，崇宁四年甚至由擅瘦金体的皇帝御笔亲书，并刻石立于百官上朝皆须经过之端礼门，蔡京自己则另书大碑，颁于州县。

皇权专制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一旦帝王做出了决定，金口玉言，便极难改变。每一个政策，对于决策者往往只需一纸之书写，或一石之刻制，而政策影响所及，金口中的一点唾沫，对于承受者便是灭顶洪流。而要改变政策，除非天呈异象，因为皇权天授。这个改变的机会出现于崇宁五年（1106）。春正月戊戌，彗星出西方。乙巳，以星变诏求直言，毁元祐党人碑。丁未，太白昼见，赦天下，诏除党人一切之禁，元祐党人也渐获叙复。而宋徽宗一开始虽被天象吓得不轻，甚至还罢了蔡京的相位，但刚刚一年，就又起复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政治就像是天气，不时就会风云突变。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通常都期盼风调雨顺。无论是平和还是狂暴，丰收还是灾荒，正常还是不常，土地都以其宽厚加以容纳，从而成就人间。在一个不时抽风的时代，人们便更加珍惜政通人和的短暂间歇。哲宗死后，当看到元祐臣僚叙复，苏轼获赦北归，礼部员外郎李格非便趁机做了一件大事，他对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小儿子赵明诚非常满意，尤其是这个小伙子为了征得其父允准还特别编了一个梦，说是梦到一处读书，醒后只记得这样几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英草拔。这种小儿科的文字游戏当然难不倒同样饱读诗书的赵父。赵父也因此明白儿子是想做“词女之夫”，便向当时家有才女词名正噪京城的李家提





亲。李格非也应该早从陈师道等朋辈口中得知这位“颇好文义”、喜收藏苏黄诗文、且还有些“失好于父”的赵家三公子，就将自己年方十八的女儿李清照嫁给了他，虽然他已年至二十一，还在太学做学生。

李清照(1084-1155)，自号易安居士，宋齐州章丘明水人，少有诗名，尤工于词，为婉约之宗，著有《李易安集》等，多不传于世，到明代才有毛氏

汲古阁辑刻《诗词杂俎》，收录《漱玉词》，仅得词十七阙，王鹏运四印斋刻本方增至五十首。

李清照家庭背景显赫，虽然她在《金石录后序》中称“赵李族寒”，这里的寒，指的是家族，而实际上，赵明诚之父已为吏部侍郎自不必说，其祖也曾在大名做过官，至于她自己这一边，她曾有《上枢密韩肖胄诗》，诗序中称“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这话可能稍有不实，因为韩公指韩肖胄之曾祖韩琦，卒于熙宁八年(1075)，而其父李格非中进士则是在熙宁九年，其中却透露出其祖乃至其父必然曾受到过韩琦之荐引。我们从而知道，赵李夫妇至少属于官三代。

更有意思的是，当李格非高中进士不久，就被宰相王珪相中，招为女婿。王珪在元丰中为丞相，据庄绰《鸡肋编》，其父准、祖贽、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而王准这一房有四个儿子，有孙婿九人都为进士出身，还有两个曾孙婿秦桧与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这也就意味着，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是李清照的表妹夫)。而据李清臣

《王文恭公珪神道碑》，李格非是王珪之长婿，时为郓州教授。只是王氏在李清照出生后不久即早逝，约在李清照八九岁左右，李格非再婚，所以我们今天在《宋史》李格非本传中看到的是：“妻王氏，拱辰孙女”。这个记载与 1976 年 3 月在河南伊川窑底村发现的王拱辰夫人《懿恪王公夫人和义郡夫人薛氏墓志铭》相符：“孙女三人，长适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王拱辰是与欧阳修同科的状元，且两人还是连襟，先后互为妻姐夫。这样李清照既有一个世代簪缨的外家，还有一位曾高中状元的继外公，以及一位文名卓著谥号文忠的姨外公。

赵家与李家

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阵营，赵挺之站在变法的一方，而李格非则在保守的营垒。也因此赵父不断高升，而李父因名列元祐党籍而不断遭受打击。好在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皆喜金石，共好文义，志同道合，国家大事虽对双方家庭有所影响，但并未过于妨碍



两人之感情。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二十八年。《金石录后序》中记述了不少他们一生中同好金石醉心文义温馨的瞬间：

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可惜这种胜于“声色狗马”“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之乐并不长久。到靖康丙午（1126）正月，金兵打到汴京城下，逼宋议和，这时赵明诚正守淄川，感觉大事不妙，看着盈箱溢箧之物，“知其必不为己物矣”，不禁四顾茫然。世间的事物总是得失参半，祸福相倚。聚的时候有多快乐，散的时候就有多痛苦。到建炎元年（1127），靖康难作后，原先精挑细选的欢愉一变而为恋恋不舍。当被迫南迁，“长物不能尽载”，于是：

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馀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建炎三年（1129）夏赵明诚冒暑奉召赴行在，因感重疾，疟且痢，终于秋八月十八日不治而逝。在奉召前被问及遇到紧急情况该怎么面对时，说：“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也大病一场，“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因赵有妹婿任职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本想跟去，且先期将行李投往，结果金人很快打下洪州。这一次的损失是“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只剩下些“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这一些能得“岿然独存”，实因“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室之内的缘故。

在宋高宗即位的头几年，因外敌的入侵，整个朝廷处在一种严重的动荡之中，身为朝廷官员的亡妻，李清照追随皇家的行踪，流离辗转，到台，之剡，出睦，逃至黄岩，雇舟入海，之温，之越，庚戌（1130）十二月，之衢，绍兴辛亥（1131）春三月，复赴越，壬子（1132），又赴杭。在这样一种动荡中，那些曾经节衣缩食得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外现的各色物品，都成为逃生的累赘，况且还有各色觊觎之眼紧盯。早在建炎三年赵明诚病危之际，就有人造

谣说他送金人玉壶，甚至向朝廷告密。这个一时之间空穴突来的“颁金”之语，让李清照惶怖不已，因“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以期有所表白，但这个朝廷总追不上，而她寄到剡中的包括写本书在内的收藏，都在官军收拾判卒时取去，“尽入故李将军家”，这样当日“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最后剩下来的，“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这些最后的宝贝，李清照“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但当她建炎三年（1130）冬来到会稽，也就是越州，“卜居土民钟氏舍”，一天晚上，小偷凿开墙壁，偷走了五簏。李清照悲恸不已，只得立赏收赎。两天后“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她知道“其盗不远”，但万计求其馀而不可得，后来听说是被一位叫吴说的转运使贱价买去。赵李收藏，最终十去七八，手头所有的，也就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而已。四百多年后明代官至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读了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后，任职吏部时遇一浙江口音钟姓人士，恨意难消，竟以开除。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吕无党抄本落款的时间是“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太岁在壬曰玄黓，绍兴二年岁在壬子，壮月是八月，朔是初一，这表明这篇后序为绍兴二年八月初一写定，正文中提到的最后时间也是壬子。序文最后一段说“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杜甫诗称陆机二十作文赋，《淮南子》称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之非，则从十八至五十二，正好三十四年。比李清照稍后的洪迈在《容斋四笔》中也记载李作后序时为五十二岁，但时间是在绍兴四年（1134）。疑问在于，如李清照建中辛巳（1101）年十八嫁与赵明诚（《金石录后序》：“余自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则到她五十二岁时为绍兴五年。这中间有两三年的时间差。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据宋人《瑞桂堂暇录》明抄及《容斋四笔》等记载，从版本角度，综合各家意见，不得已求其次，定作序年为绍兴四年，李清照时年虚岁五十一。今流传的吕无党抄本虽言之凿凿为“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但王仲闻发现这年以及绍兴四年五年八月朔都非甲寅日，所以此语为后人添加无疑。明代著名藏书家徐惟起在《徐氏笔





精》中说：“今各书所载《金石录序》皆非全文，惟余家所藏旧本序语全载。”惜乎其藏不传，但其所言表明李文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改动。

绍兴二年注定是李清照生命中极其特别的一年，虽然《金石录后序》基本被认定不太可能作于此秋，但这年夏秋间却还有一件聚讼更加纷纭的大事，那就是李清照再婚离异事。今人黄盛璋特别撰有李清照《改嫁新考》，全面汇总了宋人七种说法，其中明确提到李清照改嫁的有两三种，即比李清照稍后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与李清照大致同时的王灼《碧鸡漫志》，以及比胡仔略小的洪迈的《隶释》，一言“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一言“再嫁某氏，讼而离之”，一言“赵君无嗣，李又更嫁”。这三本书后一本成书稍晚，前两本成书于绍兴二年后约十七八年，李清照还尚在人世。胡书甚至还提到“有启事与綦处厚”，这个启事即所谓《投内翰綦公密礼启》，见载于七十多年后成书的赵彦卫《云麓漫钞》。此外，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记载绍兴二年九月戊子朔“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这样历代就有不少人士笃信李清照的确改嫁了，黄盛璋而外，还有《李清照集校注》的撰著者王仲闻、《李清照集笺注》的撰著者徐培均、《李清照评传》的撰写者陈祖美等（本文关于李清照生平主要据此三书）。但也有不少人特予辩驳，如清代的俞正燮特撰《易安居士事辑》，后陆心源撰《癸巳类稿易安事辑书后》，李慈铭又书陆氏仪顾堂题跋后予以申援。

认同者的理由主要是正史野史都有记载，且李氏在世，赵家多有在官者却迄无申斥，而反对者也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比如《投内翰綦公密礼启》主要见于胡仔之提及以及《云麓漫钞》之抄录，完全作伪或部分作伪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流传下来的李清照著述，包括《金石录后序》，多有改动及缺漏。有人以为李心传《要录》记载“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此李氏与李清照同姓，而李心传因轻信野史，将“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辞，自号易安居士”

这一显系攻讦故意混淆的注释语也加采录。与李清照大致同时的庄绰绍兴三年初撰就《鸡肋编》，其中记载有李清照靖康后诗讥士大夫及王准孙婿有李格非事，而像故相儿媳故臣遗孀改嫁这样重大的事，却未见片言只语涉及，而且该书后来还不断有所增补，显见事属子虚。词学家况周颐则从李张行迹时间上的不相合来予以辨析：“易安如有改嫁之事，当在建炎三年明诚卒后，绍兴二年汝舟编管以前。今据俞陆二家所引：建炎三年七月，易安至建康，八月，明诚卒，四年易安往台州之越州，十二月至衢州，绍兴元年复之越，二年之杭。汝舟建炎三年知明州，四年复知明州，六月主管江州太平观，绍兴二年往池州措置军务，寻为临诸军审计司，二年九月以增举入官，除名编管。此四年中两人踪迹判然，何得有嫁娶之事？”两人生活轨迹都无交集，那就当然不可能有嫁离之事了。

部分认同者以为改嫁体现了李清照追求自由的个性，为李清照作传的陈祖美教授甚至认为改嫁体现了李清照先进、超前的爱情观、道德观与价值观，以为清代为改嫁事辩诬者是站在比宋明等朝代更加强化的封建“伦纪”“庭训”与“礼义”的立场上。这又未免上纲上线。因为即使今天见到的所谓《投内翰綦公密礼启》为真，那《启》中所言“既尔苍皇，因成造次”“呻吟未定，强以同归”，也表明改嫁并不是李清照为追求自由的一次主动选择。

结合《金石录后序》，让李氏大为惶怖的传言“颁金”，很可能是当时携一个质地为珉的玉壶来看赵明诚的张飞卿学士离开后引发了通金的流言，《投内翰綦公密礼启》中也有言“取自宸衷，付之廷尉”，一个小小的承奉郎的离婚案竟能上达圣听，交付廷尉，显然匪夷所思。能够引起皇帝亲自过问的显非小可之事。而颁者赐也，即献壶于金而获金人赏赐，这才使得李清照一时之间不得不一直追随皇帝的行踪以寻机辩解，可能后来得到了綦密礼的帮助事情得以了结，所以有一纸书文示谢。但今天见载于《云麓漫钞》的《投内翰綦公密礼启》显然并非原璧。《启》中说“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与《后序》所言赵明诚病逝后“余又大病，仅存喘息”相合。既然事在赵明诚病逝之初，就显非改嫁而当是颁金。





而作伪者手法高明，真真假假，以致难以分辨。甚至也有人以为，此《启》既然首见于胡仔提及，胡又是苏东坡的崇拜者，他恼怒于李清照论词贬低苏轼，故伪造此启以诬之。

不管传言中的再嫁离异是否属实，赵明诚去世后的几年对于李清照来说是相当艰难的。这种艰难，身体上的疾病与疲于奔命还在其次，难以抑制的有失去亲人的悲痛，无法取舍的有旅途中必须随时对积年的收藏做出的选择，而无可奈何的还有那不时就得面对的藏品的失去，那种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非身当其事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李清照从靖康元年（1126）开始逃难，到建炎三年（1129）丈夫去世，到绍兴初年漂流入移，居无定所，很难想象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位失去丈夫的女性要以怎样的毅力才能坚定地度过每一天。

绍兴二年后宋高

宗的政权才稍稍稳定下来，李清照在这短暂的稳定中开始得空整理旧物，《金石录》作为丈夫的遗著是她这一时期最不忍一碰的旧物，只有当心情终于有所平复，才能稍事展卷，而展卷之时，那些像流水一般



流逝的岁月就从笔尖随墨水一道淌出，那些心中的百孔千疮就书写为纸上的百转千回。但这种平静并未持续太久，绍兴四年冬十月，金人与伪齐合兵犯淮南进，一时人心惶惶，她选择从杭州避地金华。在这里，为度长夜，她又捡拾起自己平生最喜好的博奕之戏，尤其是依经打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撰成《打马图经》。

金华是一座风景极佳的小城。她在这大约住了不到一年，于次年夏秋间返回杭州。避住的时间虽不长，而除了《打马图经》，她还

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一诗一词，诗名《八咏楼》，词名《武陵春》。

武陵春创调于宋代的毛滂，双调四十八字，上下阙各四句，三平韵。每阙各四句中分别为两七字句与两五字句交错，因而全词共有四个七字句与四个五字句。词之创调或为自度，创始者多妙解音律，或借用民间音乐，适当修订。这个词牌也有称为武林春。武林是杭州的别称。毛滂元祐间做过杭州法曹，因而很有可能是毛据当地流行音乐而创成此调。词是用于歌唱的，因而曲调相对固定，而歌词则可据调调整，因而可长可短。像临江仙，起首的七字句，便多有作六字者，其结句为两五字句，其前一五字句，也多有作四字者。像这个词牌，四个五字句，也多有改作六字而为两个三字句者。万俟咏的《武陵春·燕子飞来春在否》甚至将四个五字句都改成了两个三字句。李清照的这首《春晚》则只有下结改成了两个三字句。

李清照创作这首词的时候是在绍兴五年（1135），她人生的第五十二个年头。这首词描写的是晚春的景象，收录此词的多数选本如《类编草堂诗馀》《古今词统》等词题皆名为《春晚》，也有作《暮春》或《春暮》的，只有《词汇》作《春晓》。孟浩然诗《春晓》多有版本作《春晚》，从眠起的角度是春晓，而从花落的角度则是春晚。与孟诗晓晚两可不同的是，李词重点写的是晚春时事，所以不当名《春晓》。

这首《武陵春》在元至正本《草堂诗馀》中未注撰人，明叶盛《水东日记》则称引为李易安。下面分韵试析。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花已尽，有版本作春
已尽，误，春字不若花





字，春与下起重复，而花字与尘香有呼应。花落于泥，或碾作尘，则尘也泛香，即使不碾作尘，尘沾春花，也花香沾染。花因风落尽，风虽暂住，而春却远去，惟余一地泥尘犹带花香。风住尘香是结果，而风吹花尽则是原因。

日晚，也有作“日晓”，就像这首词之词题一样，多属浅人妄改。改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晚字的误解，即将日晚理解成天晚，既然天色已晚，还梳头作甚？不知晚字既可指时间上之早晚，也可指时间上之先后。日晚，就是起来晚了，或者即使起得早，而挨延晚了。挨晚了而却连头也不梳，原因在于一个“倦”字。这个“倦”，主要是心理上的一种严重疲惫，从而对万事万物缺少兴趣。正是因为倦，所以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况且还值风吹雨打，春花落尽。如果作“日晓”，就是早上起来了，却疲倦而不想梳头，由于少了挨拖而晚与倦之间的呼应，就明显过于浅白。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此词牌上阙共四句，有三句押韵。起两句一韵，而此段有两韵。

物是人非，紧承上韵之倦。人何以会倦？且起床后对啥都不感兴趣，连头也不梳？除了环境的花尽尘香，更有人事上的物是人非。物是人非一语源自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文选》李周翰注称：“时物虽是而友朋非旧。”四季轮替，时物光景会周期性地重来，而那些曾经与共朝夕的朋旧亲人却一散无踪，一去不回。

同样的晚春，时光往前推三十来年，当她或者还是一位如花的少女，更可能是一位初嫁之少妇时，她笔下的《如梦令》，正像她如梦的年华：“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所谓年少不识愁滋味，没有太多的心思，心里眼里，更多只在那些花花草草，稍有风吹雨动，急欲想知道的是，那开在春天里的海棠在风雨后到底成了一番怎生的模样。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稚态十足的推问与灵性充满的回答，让人们不免惊叹于那未经风霜活蹦乱跳多情善感而又情思清丽的青春。而那“买得一枝春欲放”的青春，那“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的愁绪，那“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自负，那“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惆怅，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声声慢诉，一切的一切，都迅成过往，物是人非，事事皆休，而“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能说些什么呢？当年虽“武陵人远”，“多少事，欲说还休”，而尚有“终日凝眸”的企盼，现在啥也说不了，就像撑船之竹竿，休提起，提起泪洒江河。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双溪在金华城南，据《浙江通志》卷十七山川九引《名胜志》，一曰东港，一曰南港。东港源出东阳县大盆山，经义乌西行入县境，又汇慈溪、白溪、玉泉溪、坦溪、赤松溪经石碕岩下与南港会。南港源出缙云黄碧山，经永康、义乌入县境，又合松溪、梅溪水，绕屏山西北行，与东港会于城下，故曰双溪。大概即今金华东阳江与武义江交汇处。今天在东阳江北岸还建有八咏公园。八咏事出沈约，他在南朝齐隆昌元年（494）出任东阳郡太守。东阳即今金华。沈到任后不久建玄畅楼，楼成遂登楼赋诗八句：登楼望秋月，会圃临春风。岁暮悯衰草，霜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珮去朝市，被褐守山东。诗成还觉意有未尽，更就每句扩而为八咏。后世为纪念他也因此将玄畅楼改成八咏楼。李白也曾到过这里，他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一诗中还提到“沈约八咏楼，城西孤岩峣”，明确记述了八咏楼在金华的相对地理位置。有趣的是，今天金华为纪念李清照而命名的清照路正是在八咏公园沿东阳江东去不远的江边。

这里正像沈约所描述的，水流三派，台高四临，“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风景极佳。李清照也曾一登八咏楼，以为此地“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这些年她不停地逃难，曾经有一年夏天逃经项羽自刎的乌江，想到朝廷多贪生怕死之辈，无一个堪当大任的英雄，不禁感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逃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人也终于疲倦了，江山还是“留与后人愁”吧。而在一种万事不欲





经心的情绪下，春天竟不知不觉地快过去了，忽然听得有人说双溪的春色还好，不禁想着是不是要去划划船。当年轻时，遇有好景，那时是多么地自由啊。“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在诗人青春的笔下，那些景色也像青春一样活泼。

而现在，春尚好，一个“尚”字，让人感到一个将去未去的春天在做最后的坚持，而一个“闻”字，则将一个身心疲惫的诗人情绪的百无聊赖泄露无疑。自己从未主动去打听，一切都是被动听闻。从这个“闻”字，也可看出李清照应该不是一个人独居。虽然胡仔记述赵明诚没有子嗣，但他应有另娶，或至少蓄有妾侍，《金石录后序》就明确提到赵明诚临终绝笔“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所谓分香卖履，典出曹操。陆机《吊魏武帝文》序引曹操遗令：徐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即使其他夫人或妾侍也无所出，而李清照至少还有一个弟弟李远，赵明诚也有两个兄长，动荡的时候，他们之间应该有所联系，李清照的身边应该有他们的子女，《打马图经序》就明确提到“使儿辈图之”，就是让后辈替她画图。因而双溪之春尚好，也应该就是从这些孩子们听来的。

也拟泛轻舟。此句要表达的意思应该主要是想出门游游春，而一个“拟”字，却重在引出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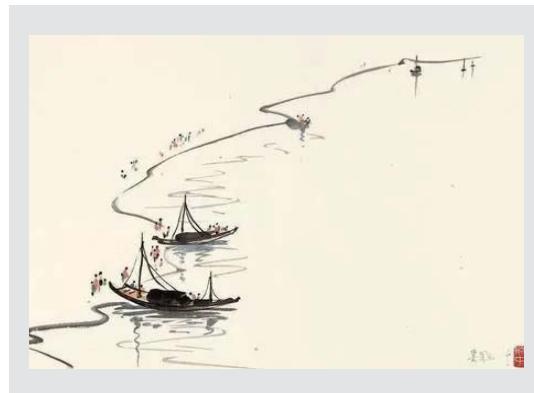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双溪应该离李清照在金华的住处不远，而打算出游时她为什么选择“泛轻舟”呢？

武陵春这个词牌也有武林春等名，后定名为武陵春。古人对于取名通常比较讲究。如果是武林春，相对来说便只是一个地方小调。而作武陵春，因源自《桃花源记》，便有了一种逃尘世外的意味。在陶渊明的笔下，武陵人捕鱼为业，所以小舟是必备的生存工具，一日缘溪而行，忘路之远近，遇山口，舍船而入，乃见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皆怡然自乐，自云先世避秦，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而泛舟云云就不仅仅只是游春时交通工具的一种选择，而更是心灵对于远离人世烦恼的一种渴望。

不过渴望终归是渴望。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理想是犹可想象之轻，而现实则是无法承受之重。对于一个满怀愁绪的人，仙境太难靠近，即使有了可渡之舟，而一个“恐”字，最能表明在前往理想之途的过程上存在着随时可能出现的障碍，甚至这个障碍中最大的就是我们无能排遣的情感，无法释怀的忧愁，它重到所渡之舟也无法承载。

有意思的是，舟前的修饰词是舴艋。而舴艋舟也者，因船形似蚱蜢而得名。蚱蜢是一种身体细长而尖的小蝗虫，舴艋则是舟中细长而尖者。这种小舟的得名不晚



于三国魏时。魏明帝时张揖编撰《广雅》便有“舴艋，舟也”的解释。唐代的李德裕有诗专咏舴艋舟：无轻舴艋舟，始自鵩夷子。意思是不要小看这种小舟，它乃创自曾为勾践相国别号鵩夷子皮的范蠡。《史记》中记载范蠡功成身退，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因而舴艋舟也就类同于扁舟。舴艋舟扁舟因其小，通常只适合于渔民在小江河湖捕鱼之用，如武陵人。

舴艋舟虽体型细小，却并不妨碍李清照的才思的充分发挥。或者正是因为这种细小，李清照忽然联想到了自己多到无法遣除的愁绪，因而将两者并列到了一起，舴艋舟，许多愁，然后在这简单的并列间只插入了一句“载不动”，两种寻常的意象便发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关联，这里有一种点石成金的奇妙，只有那些深具诗心的人才能于碌碌的生活中激发灵性，妙悟日常。

李清照未出嫁即有诗名，于词尤所擅场，这除了聪明好学，还在于她笔触善于描抹，而这些都依赖于一颗良善而又极富见解的心





灵。她在出嫁之前曾见张文潜《浯溪中兴颂诗》（一说为秦观作所）而连和二首，宋代的周煇在《清波杂志》中感慨道：“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明代的陈宏绪在《寒夜录》中则称赞备至，以为“二诗奇气横溢”，而其“古文、诗歌、小词，并擅胜场，虽秦黄辈犹难之，称古今才妇第一，不虚也”。一个人要写好诗词，使人一见其诗句而即能印象深刻并记住其人，才、情、学、识，缺一不可。李清照之才、情与学，我们从她的词，从她的《金石录后序》已有充分领略，而她的识见同样不同流俗。靖康之变后，她应该是属于力主抗金的主战派，可惜“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时无英雄，她一介女流，无法力挽狂澜，只能作诗讥诋。

即使是在对于词的看法上，她年轻时也能独树词“别是一家”之高帜，并信笔评点，将她以前的所有名家尽数数落。在她看来，李氏君臣乃亡国之音，柳永“词语尘下”，张先、宋祁等皆“破碎”，不足名家，像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王安石、曾巩等人文章写得好，但“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她心目中较为认可的词人是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人，但“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也就是说，词别是一家，词有词的声律，不能写成诗，要在铺叙、典重、情致、故实之间达成统一。

她的要求无乃太高，所以在她眼里也几无完人。即使是她自己，要做到她所说这几点也不容易。就这一首武陵春来说，李清照大致避免了她所指摘的晏几道、贺铸与黄庭坚的毛病，但秦观之讥，自所不免。她对苏东坡以诗为词的做法最是不满，但诗与词的区别应该主要在格律上，在表情达意上不应该存在区别。她晚年所作《永遇乐》起首即言“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实际上也难逃句读不葺之诗之讥。或者说随着生活磨折的日渐增加，李清照的创作也在不知不觉间作着改变。她的父亲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她对苏轼，从“学际天人”“酌蠡水于大海”的表述，也可看出心怀景

仰。她的这首词实际上也化用了苏轼的一句词。大概在她出生的那一年，苏东坡从扬州到高邮与秦观相会，后于淮河边饮别，东坡因填《虞美人》调，其中上结为：“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这世间人最难是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恰惟有情，遂多愁，多恨，多泪。这泪，未语先流，甚至都不用太多的铺叙，只要在苦难中经历过，那种物是人非，那种前尘后影，就足以供泪线无限垂伸；这恨，不言而至，似乎多到可以化虚为实，以船满载；而这愁，也不请自来，甚至船都载不下。从可以船载的恨，到舟载不动的愁，一个晚辈，一位女性，就这样默默地继承，并悄悄地超越。

而作为一位文采杰出的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里，她无疑是相当另类的。虽然唐宋时妇女地位不像元明后理学占主导时那样低下，虽然“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到明代中后期才由陈继儒提出，但在实际生活中则多为社会所默认，甚至女子也多主动持有这种看法。南宋的陆游曾为文林郎宁海军节度推官苏豫亡妻撰写过《夫人孙氏墓志铭》，提到孙夫人幼有淑质，而已故赵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之，时夫人始十馀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孙夫人卒于绍熙四年（1193），享年五十有三。则当其十岁时，正绍兴二十年（1150年），李清照时年六十七岁。孙氏十来岁时，正值李清照古稀前后，她好不容易发现一个聪颖的小辈，却被以“才藻非女子事”为由拒绝了。我们可以想象李清照当时的感受。日晚倦梳头，这种倦，明里是饱经世事沧桑后的身心疲惫，而隐隐地更有那种举目四望万人如海而无人可语无法言喻的旷世孤独。





读《迦陵论词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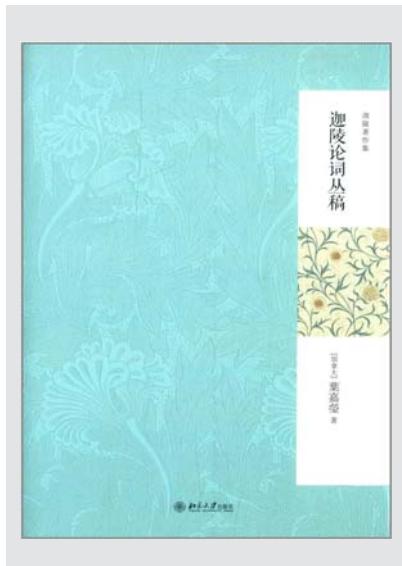
◎ 刘沛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级硕士生）

《迦陵论词丛稿》是一部研究古代词人、词作及有关词论的专集。全书二十五万余字，包含叶嘉莹先生的 10 篇词论文章，是叶嘉莹先生词论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运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古典诗词与古典文论，对于古典诗歌与古典文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的发展都有贡献。阅读完本书，我认为书中的主要内容可以提炼为评词“在神不在貌”、以独特视角关注女性叙写、将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词作相联系这样三个主题。

评词“在神不在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提到：“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随作艳语，终有品格。”叶嘉莹认为“神”所指的是作品中感发生命之内在的本质，“貌”则应当指作品中所叙写的外表的情事。

一般说来，这种重神不重貌的评赏态度，在对“词”的评赏中更为重要。这主要因为，“诗”与“词”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体式，本来就具有着不同的特性。“诗”在很早就已经形成了以“言志”为主的传统，而且往往在诗题中便已经把内容主旨作了明白的提示；因



此，在对于“诗”的衡量评赏中，关于“貌”这方面所占的比重也就显得比“词”更为重要。而“词”这种体式，在初起时却只是在歌筵酒席间供人演唱的艳歌，当时的作者并未将“词”纳入可以与“诗”并列的“言志”的传统之中；因此，如果只从“貌”这一方面来讲，“词”的伦理价值有时似乎就有疑问了。

这一类作品，纵然在外貌上所写的只是一些情诗艳词，可是就其本质所能带给读者的影响而言，有时却竟能唤起读者心灵中某种崇高美好的意念，引起一种正面的伦理的感发。这正是五代、北宋一些词人所曾经达到的成就。在本书中所曾谈到的几位词人，对于能够感受作品中本质的读者而言，便可以具备引起内心某种正面伦理价值的可能。因此，常州派词人对于五代、北宋这一类作品才会有比兴寄托之说，而王国维也才会由这些词作而引发出“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三种境界，以及诗人“忧生”与“忧世”的联想。

叶嘉莹提到自己在国内教课，讲到陶渊明《饮酒诗》“栖栖失群鸟”一首的结尾“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两句时，曾举引韦庄《思帝乡》词中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几句，与陶诗相并论。如果从陶渊明与韦庄之为人及其作品中之现实情意来看，二者可能本来相距甚远。陶渊明是借鸟为象喻来叙写他在人生之途中一项重大的抉择，他所写的是他与旧所归属的官僚社会的彻底脱离，决心回到田园去躬耕的决志；而韦庄所写的则很可能只是一个热情的少女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一首情诗。但不管他们所写的现实、情事相差何等遥远，若就诗歌之感发生命的本质而言，他们严肃认真的选择，和他们献身无悔的决志，在基本上是



叶 嘉 莹





有着相通之处的。他们都同样表现出一种千古仍足以使人激励感发的择善固执的精神，而这种使人激励感发的作用正是中国古典文学为我们留传下来的一份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就像叶嘉莹在书中所说的：

“因为一般说来，凡是真正具有感发之生命，而且在感发之本质上具有真正优美之品质的作品，便都有着足以引发读者心灵中某种美好之意念及联想的力量，即使像梦窗这样一位被人认为在品节上有所玷污的作者，他的作品中也仍然闪现着心灵之光焰向着崇高美好之一面的光芒，这是我们在传承古代的精神文化之遗产时，所决不该加以忽视的。”

以独特视角关注女性叙写

长久以来，与诗相比，词都具有通俗的特征，会包含更多关于美女与爱情的叙写，“诗庄词媚”的说法为论词者的共同认知。词中关于美女与爱情的叙写，无论是在道德传统还是诗歌传统中，都是被士大夫们所鄙薄和轻视的，常被称为“艳歌”“郑声”“末技”等，但有趣的是，他们又被这类小词的美所吸引，加入写作的行列。

当时的士大夫在作诗、写文方面曾长久受到“言志”“载道”之说的压抑，而这种歌辞之文体在写作时可以完全摆脱束缚，所以将心中某种幽微、浪漫的情感借此宣泄出来。在写作、评赏的实践过程中，他们体会到这类小词透过表面所写的美女与爱情的内容，竟然含有一种可以供人吟味的幽微意蕴与情致，这种情致于作者而言并非出于显意识的有心抒写。

然而，对于词为何能够形成此种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意致为美的特质的基本原因，词论者尚未曾做出探讨。针对这一词学困惑，叶嘉莹认为可以从女性叙写的角度来探究。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叶嘉莹从女性形象、女性语言以及“双性人格”三个方面探究花间词中深微幽隐的美感形成的原因。

同样是叙写美女与爱情的作品，为什么只有“词”这种文类中的一些作品才特别富于引人言外之想的要眇宜修的特质？对于这一问题，西方女性文论中对作品中女性形象之身份性质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中国的文学史中，虽然早就已经有了关于美女与爱情的叙写，但事实上各种不同时代、不同体式的文学作品中，其所叙写的女性形象身份性质，以及其所用以叙写的口吻方式，却有着极大的差别。

《诗经》中所叙写的女性，大多是具有明确伦理身份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其叙写方式，亦大多采用写实的口吻；《楚辞》中所叙写之女性，则大多不是现实中的女性，其叙写方式大多采用喻托口吻；南朝乐府吴歌及西曲中所叙写之女性，则大多为恋爱中的女性，叙写方式则大多是采用素朴的民间女子自言的口吻；至于宫体诗中所叙写之女性，则大多为男子目光中所见的女性，叙写方式乃大多采用刻画形貌的咏物口吻；到了唐人的宫怨和闺怨诗中所叙写的女性，则大多亦为在现实中具有明确伦理身份的女性，叙写方式则大多是以男性诗人为女子代言的口吻写出。如果以词中所叙写的女性形象，与以上各文类中不同的女性形象相比较，我们就会有一种奇妙的发现，那就是词中所写的女性，似乎是种介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的美色与爱情的化身。

《花间集》中所选录的作品原是“绮筵公子”为“绣幌佳人”而写的歌，其中所写女性应该是那些歌儿酒女的形象，如此说来，则此一类女性形象自当是现实中的女性。可是这一类女性却又并无家庭伦理中的任何身份可以归属，只不过是供男子们寻欢作乐的对象。《花间集》中的作品，正是出于那些追欢取乐的男性作家之手，其写作之重点乃集中于对女性的美色与爱情的叙写，而“美”与“爱”则恰好又是最富于普遍之象喻性的两种品质，因此所写的女性形象



介乎写实
与非写实
之间，可
以产生非
现实之想
的潜藏的
象喻性。





如果以这一类女性形象与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其他文类中的女性相比，则《诗经》中所写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可以说基本上并不是什么象喻性，即使后世的说诗人可以据之为美刺讽喻之说，也只是后加的一种比附，而并非其所写之女性形象本身所具含的特质。至于《楚辞》中所写的女性，则大多本出于作者有心之托喻，而有心之托喻，则一般皆有较明白的喻旨可以推寻，这与花间词中本无托喻用心，而本身却极富象喻潜能的女性形象是不同的。再就吴歌及西曲中的女性而言，则此类乐府歌辞本出于民间，观其口吻盖多为女子自述，所叙写大多为现实女性的情歌，并无象喻色彩。就宫体诗而言，所写的是被物化的女性，作者在叙写时，很少有主观感情投入，但花间词中所写的女性则正是爱情所投注的主要的对象，具有一种象喻的潜能。再就唐代的闺怨之诗言之，一种怨诗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女性所实有的空虚寂寞，另种怨诗所写者则是假托女性怨情来确写男性诗人自不得知遇的悲慨。前者与《诗经》中的思妇弃妇性质相近，后者则与《楚辞》中的托喻的性质相近，不及花间词中女性想象的象喻潜能大。

以上是透过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反思，这是形成词特别富于引人生言外之想的象喻之潜能的一项主要因素。其次，叶嘉莹还提出词的“女性化语言”的问题。关于词与诗语言的不同，前代词学家早曾注意到，所谓“诗庄词媚”为论词者的共同认知。词与诗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别，主要在于诗的句式整齐，而词句式参差变化。

词语言形式的参差错落，乃是造成其与诗语言的性质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二者区别又不仅在形式上的不同。《王直方诗话》曾载苏轼与晁补之与张耒论诗的言论，晁、张云：“少游（秦观）诗似小词，先生（苏轼）小词似诗。”元好问《论诗绝句》也曾引秦观《春日》诗中的两句而评之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可见词的语言与诗的语言也有着性质方面的差别。秦观的诗被评为“女郎诗”，又被评为“诗似小词”，都足以说明“词”较之于“诗”是一种更为女性化

的语言。那么究竟怎样的语言才是女性化的语言呢？在这里作者借用了国外学者的观点。

在英国任教的一位女性主义文评家特丽·莫艾在其《性别的、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一书中，曾指出一般人的看法，总以为男性（masculine）所代表的乃是理性（reason）、秩序（order）和明晰（ucidity），而女性（femininity）所代表的则是非理性（irationality）、混乱（chaos）和破碎（fragmentation）。如果从西方女性主义所提出的两性语言之性质方面的差别来看，则诗的语言是一种更为有秩序的明晰的男性语言，而词则是比较混乱和破碎的一种女性语言。中国的小词证明了这种混乱而破碎的语言形式，不仅不是一种低劣的缺点，而且还正是形成了词的曲折幽隐，富有引人言外之想的独特美感。

但事实上这其间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女性文学批评所谓的“女性语言”，本是指女性作者所使用的语言，但《花间集》中所收录的十八位词人都是男性的作者，于是花间词特质的形成，除去已讨论过的两项因素以外，还应再加入一项更重要的因素，即由男性作者使用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来创作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品质。关于此种特殊之品质，叶嘉莹认为西方女性文学批评近年来所提出的“双性人格”概念可以提供参考。

西方的女性文评，近年来已逐渐脱离了早期的女性与男性互相对立抗争的狭隘观念，而发展成为一种由女性意识的觉醒，一些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建立，卡洛琳·郝贝兰（Carolyn · Heilbrun）在其《朝向雌雄同体的认识》（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一书中提出“雌雄同体”（androgyny）的观念。这原是古代的一个希腊语，其字原是结合了 andro（男性）与 gyn（女性）两个字而形成的一个词语，本意原指生理上雌雄同体的一种特殊现象，但郝贝兰提出此一词语，则意指性别的特质与两性所表现的人类的性向，本不应做强制的划分，因此“androgyny”一词，也可将之译为“双性人格”。

《花间集》的作者是男性的诗人文士，当他们尝试仿效女子的口吻来写那些相思怨别之情的时候，就产生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是他们大多把那些恋情中的女子加上了一层理想化的色彩，一





方面极写其姿容衣饰之美，一方面则极写其相思情意之深，而却把男子自己的自私和负心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女子的责怨，都隐藏起来而略去不提。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的女子成为了一个忠贞而挚情的美与爱的化身。其二，由于“逐臣”与“弃妻”在中国旧社会中伦理地位之相似，以及“弃妇”之词在中国诗歌中所形成的悠久之传统，因此当那些男性的诗人文士们在化身为女子的角色 (persona) 而写作相思怨别的小词时，往往于无意间就竟然也流露出了他们自己内心中所蕴含的“不能自言之情”。这种情况当然可以说是一种“双性人格”表现。由此“双性人格”所形成的一种特质是使得花间小词成就其幽微要眇、具含有丰富潜能的另一项重大的因素。

将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词作相联系

自 60 年代末出国，叶嘉莹游历西欧、北美、日本，定居于加拿大，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翻译等课程。处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中，她对诠释学、读者反应论和接受理论、现象学等西方的文学理论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她给非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教授中国古典诗词时，必须以学生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解作品，因此，叶嘉莹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授课方式，即将中国传统的评说方式与西方文学理论结合起来阐发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蕴。

《迦陵论词丛稿》也体现了叶嘉莹将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词作相联系的独特风格，尤其表现在《迦陵论词丛稿》中对温庭筠、吴文英的词作的分析中。

吴梦窗的词，有将近三百五十首之多，在南宋诸词人中，除了首屈一指的大家辛弃疾以外，几乎没有可以与之相比。所



吴梦窗

以仅以数量言，梦窗的词在两宋词人中应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更何况以意境、工力而言，梦窗意境深远、工力精至，有非常人可及之处。然而不幸的是，梦窗词流传不及周敦颐、辛弃疾广，所得的评价更是毁誉参半。几乎自南宋以来，梦窗的词就一直在被人误解，甚至不解之中。

叶嘉莹对吴梦窗词艺术特色的探索，很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的影响。她明确地指出：“梦窗词之遗弃传统而近于现代化的地方，最重要的乃是他完全摆脱了传统上理性的羁束，因之在他的词作中，就表现了两点特色：其一是他的叙述往往使时间与空间为交错之杂揉；其二是他的修辞往往但凭一己之感性所得，而不依循理性所惯见习知的方法。”她认为梦窗词之所以不易为人理解，屡屡受到讥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吴梦窗的创作手法在以上两个方面很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派。这种看法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与欣赏梦窗词。

先谈梦窗词中运用的“时间与空间错综杂揉”的艺术手法。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小说、诗歌与电影常常采用这种手法，以人物的意识流动作为总的贯穿线索，打破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顺序，三种时间交错跳动地出现，空间变动的幅度也非常大。吴梦窗（约1200-1260）生于南宋时代，距今七百多年，却采用这种手法写词，当然不易为人理解。因此，早在南宋，词论家张炎就在《词源》中讥评梦窗词说：“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胡适在《词选》一书中也曾举吴梦窗咏玉兰的《琐窗寒》为例，加以讥评说：“这一大串的套语与古典，堆砌起来，中间又没有什么诗的情绪或诗的意境，作个纲领，我们只见他时而说人，时而说花，一会儿说蛮腥和吴苑，一会儿又在咸阳送客了。”

他们都看不出吴梦窗的“七宝楼台”中贯串着作者的意识，梦窗词表面上错乱的时间、空间并不是一堆零乱不堪的珍珠，而是由作者的意识串成的一朵珠花。叶嘉莹用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时空交错杂揉”的观点来分析梦窗词，让我们看到咏玉兰的《琐窗寒》





时而说人，时而说花，一会儿说蛮腥和吴苑，一会儿又在咸阳送客，并非七拼八凑，而是有作者的意识贯串其间，自然流转，妙趣天成。她在书中这样解释：

其实就诗人之感发与联想而言，方其对花怀人之际，在其意念中，花与人原来就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则梦窗自然大可以“时而出花，时而说人”了。至于“蛮腥”和“吴苑”，乃是暗指江南，写花所产之地；“咸阳送客”，则是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的典故，写花所触引感发的一段哀怨的离思。“咸阳”原不必指陕西之“咸阳”，而“吴苑”亦不必指夫差之宫苑，则又何怪乎梦窗“一会儿说蛮腥和吴苑，一会儿又在咸阳送客了”呢？

又如梦窗之《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词“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慳会遇，同翦灯语，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数句，如果仅从字面来看，则地在西窗，何有残碑？事为翦灯，何缘拂土？此种空间与时间之错综，亦非理性可以接受，然而乃竟由于此一错综之结合，而白昼登禹陵时所感到的三千年往事之兴亡悲慨，乃于深宵剪灯共语之际，而意义涌现在灯前，且与人世无常的悲慨融为一体。

梦窗词背弃传统理性，运用感性修辞的手法，这一点也近似于西方的现代派。叶嘉莹指出西方现代派大师艾略特“在《普鲁佛克的情歌》一诗的开端就曾用一只慵懒的猫的揉摩腰背的动作来描写慵倦的暮靄。以理性来说，则暮靄不会有腰与背，然而透过了描写猫的动作的字样，我们却对暮靄中那一种奄奄然墉倦无奈的感觉，有了更亲切鲜明的感受。”梦窗词中的某些修辞也类似此处所举的艾略特的感性修辞，从理性上来说似乎全无道理，但其中却熔铸着作者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也能给读者以强烈新鲜的感受。关于这类感性修辞的实例，梦窗词《高阳台·丰乐楼》和《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中的“愁鱼”“酸风”等也属于此类，叶嘉莹对它们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它们背离了传统的修辞，但其中蕴含着敏锐的感受与丰富的联想。

叶嘉莹还从尼采和康德的美学理论中受到启发，揭示了飞卿词

在艺术上客观、纯美的两大特色。先谈飞卿词的第一个艺术特色。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艺术分为酒神的艺术与日神的艺术。酒神的艺术表现了狂热与陶醉，着重在自己感情的活动中领略世界的美，音乐和舞蹈属于这类艺术；日神的艺术表现安详，以旁观的地位和冷静的态度来欣赏世界的美，绘画和雕刻

等造型艺术属于这一类。叶嘉莹认为，一般的诗词虽然大都接近酒神的艺术，但温飞卿的词却接近日神的艺术，给人的感觉不是情绪激动陶醉哀伤，而是理智澄澈冷静安详。因此，她认为飞卿词多为客观之作，具有安恬静穆之美。

叶嘉莹认为飞卿词的第二个艺术特色是近于纯粹的美。德国哲学家康德将“美”分别为“纯粹的美”(pure beauty) 及“有依赖的美”(dependent beauty) 二种。所谓纯粹的美，表现在颜色、线形、声音诸元素的和谐组合中，而不牵涉任何意义。如西洋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及立体派画家的作品，让人看上去只觉得美，而不必深究其所表现的意义。所谓有依赖的美，则在形式之外别具意义，用表现某种意义触动人的情绪，因而生出美感，如佛像、耶教圣像、渔樵耕读图等。飞卿词所表现的美属于前一种“纯美”。比如《菩萨蛮》中的“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等句，都是以金碧华丽的色彩、抑扬长短的音节和美艳精巧的物象来唤起读者的美感，把读者带入美的境界。除此以外，其中不一定有什么深意，强作解人反而会感到晦涩难通。作者认为读飞



飞卿词





卿词，正因为是纯美的欣赏，不受任何意义所拘限，所以联想也最自由、丰富，这正是温词被人解释为有寄托的原因，但温飞卿自己在创作时不一定有寄托。

（本文来自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随波逐流读书会”2021年6月1日的读书活动）

《迦陵论词丛稿》叶嘉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作者从事词学研究五十年来，由对个别词人词作的评赏到反思词学批评理论的不懈求索的坚实足迹。作者有意选择了一些不崇高、不完美的作品，认为衡量优秀词作应当以其感发之生命在本质方面的价值为主，而不应只着眼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情事。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现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20世纪70年代，已是多所世界名牌大学教授的叶嘉莹，愿不要任何报酬回国教书。叶嘉莹一直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擅长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把当代西方文学概念融会、应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探讨和诠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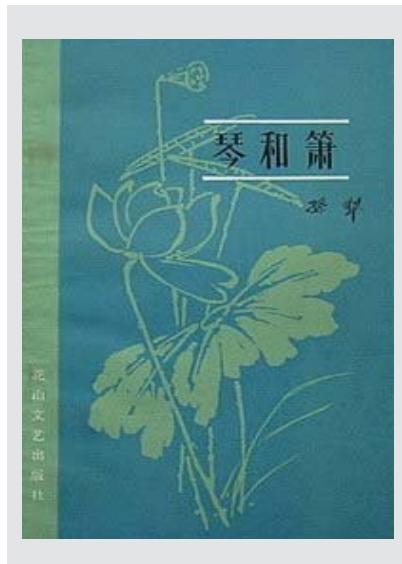
诚挚的情和诗意的美

◎ 毛本栋（湖北武汉）

《琴和箫》是一册窄三十二开的薄薄的小书，从旧书店里淘回。多年前，我也是在那里淘到孙犁的《白洋淀之曲》《秀露集》《芸斋小说》等，都是分量颇重的小书。这种淘书乐，可遇不可求。每晚灯下亲炙这些心仪的小书，其间的乐趣，不足为外人道。《琴和箫》书小分量重，是孙犁研究专家、作家冉淮舟在1981年为孙犁编的一本白洋淀作品专

集，辑录了孙犁描写白洋淀生活的全部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凡二十一篇（首），包括代序《同口旧事》在内。《同口旧事》虽作了全书的序，但其本身实在是一篇写得极好的散文。

每读《琴和箫》前，我都要细细端详封面半晌，恍然觉得有阵阵荷香扑鼻而来。浅蓝色的封面上，印着几茎淡绿色的荷叶、荷花和莲蓬，可谓一幅“荷家族图”。一茎老荷，叶面支离残破，似要矮下去了，已渐入老境；两茎新荷，亭亭玉立，嫩叶尚未完全舒展，似中间鼓两头尖的梭子；一朵荷花兀自怒放，与头顶高耸的莲蓬相映成趣；那株莲蓬水平向前，与荷茎垂直，仿佛高架的喇叭，播送夏日荷塘的消息。整幅画面清新雅逸，寄意遥深，与孙犁作品的内





容和风格浑然相契。这本书 1982 年 12 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印行，书前有一帧孙犁伏案写作的黑白照和一张手稿。《琴和箫》是第一篇作品。

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倾心与擅写的地域，那一方地域的自然风物、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集体人格也影响和塑造了作家的文学品性。孙犁的创作之路与白洋淀紧密相连，他的一生与白洋淀结下了深厚情缘，白洋淀也深刻影响了孙犁的文学风格，形成了一种文学流派“白洋淀派”，以其美好的女性形象塑造、清新的田园乡土描绘以及充满诗意美的语言，深受读者喜爱，获得拥趸无数。

通读《琴和箫》中的作品，眼前呈现出一幅孙犁与白洋淀这方热土密切相关的创作地图。毋容置疑，淀水清澈、芦苇万顷的白洋淀是这张地图的中心。

1935 年，22 岁的孙犁在北平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每天晚饭后，他就到房后面的操场上去，望着周围灰色的墙，满心绝望。他想离开那里，想起在中学时，一位国文老师讲述济南泉柳之美，他幻想能到济南去。但连路费也没有，只好又回到老家。1936 年暑假之后，他辗转来到白洋淀。从 1936 年到 1937 年，孙犁在白洋淀边安新县同口镇教书，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劳动生活。

1937 年暑假，全面抗战开始后，孙犁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投身于抗日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行进在抗日队伍的行列中。1939 年



1945 年，孙犁在荷花淀

12月20日，他在阜平东湾，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白洋淀之曲》，这是孙犁最早描写白洋淀战斗生活的作品。又过了近三年，1942年8月25日，他在阜平写出小说《琴和箫》，初载于1943年4月10日《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鼓》上，原名《爹娘留下的琴和箫》，这是孙犁早期创作的重要作品，写得颇精彩，被作家徐怀中誉为“天籁乐章”，认为它是孙犁抗日战争短篇小说中“特别有韵致和耐人品味的一篇”（徐怀中《天籁乐章——读孙犁小说<琴和箫>》）。《琴和箫》发表三年之后，即1945年，身在延安的孙犁写了一篇题为《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散文，后来以“解放区生活报道”为副题，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一些场景和《琴和箫》很相近。小说《琴和箫》可以说是一篇真实的回忆。孙犁在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内心强烈的激情，却着墨冲淡，不事渲染，透出清澈纯净的情调，仿佛一把南胡、一管洞箫的合奏，悠远而深沉，略带一缕淡淡的忧伤。同年，孙犁在延安又写出了众所周知的小说《荷花淀》和《芦花荡》，都以“白洋淀纪事”为副题。《荷花淀》首先在当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

孙犁的创作活动，从一开始就和白洋淀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以后的创作岁月里，他还是不断地唱出关于白洋淀的歌。这些歌无不洋溢着他那对白洋淀满腔真挚的热情。1945年冬，孙犁从延安经张家口回到冀中，1946年写出被视为《荷花淀》姊妹篇的《嘱咐》。1947年，他以记者身份到白洋淀地区采访，写出《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等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1949年到天津以后，他也深深怀念着那里的人民，以充满诗意的语言写出了小说《采蒲台》。

1963年2月的一个晚上，孙犁在北京拜访白洋淀的老友，友人以诗相赠，孙犁回家后即以原韵奉和：“碧水晴天柳色新，小镇危楼异乡人。曾蒙枉驾相砥砺，又同戎马走烟尘。白洋战绩著青史，我艺雕虫少奇文。京师再会白鬓发，围炉话旧暖如春。”这首诗真切地写出了孙犁对白洋淀的赞美，以及对他在那里结识的朋友的深情。

1972年，孙犁又回白洋淀，创作了京剧脚本《莲花淀》。后来，孙犁又为此剧本写了一篇序文，就是散文名篇《戏的梦》。





在这些关于白洋淀的作品中，孙犁投注了真挚而深切的情感，这是它们具有一种撼人心魄、洗涤心灵的感人力的主要因素。后来在谈到《荷花淀》的创作时，孙犁满怀深情与自信地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诚如斯言，孙犁有关白洋淀的作品，几乎都和那里的抗战生活有关。白洋淀的人民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很强烈，他们积极强烈要求保家卫国，要求武装抗日。孙犁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

从1939年写《白洋淀之曲》，到1980年写《被删小记》，孙犁关于白洋淀的写作，长达40余年，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杂文等众多形式，读后眼前呈现出一派荷风熏日、淀水潋滟的诗意图景，就连战争的烽烟也消融于静美的荷淀里。孙犁的白洋淀作品里有最美的景色，最美的人物，使用的是最美的文字，成为众所传颂的最美的作品。这种美是具体的，是丰富的，是清馨质朴的。读着《琴和箫》，我随手摘下书中几段诗意化的语句，置于枕边，临睡前时常品读，总能在一片诗情缱绻中安然入梦。

《荷花淀》：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芦花荡》：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的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采蒲台》：越过平原，越过一条大堤，就是白洋淀水乡了。这里地势低下，云雾很低，风声很急，淀水清澈得发黑色。芦苇万顷，俯仰吐穗。……

采蒲台是水淀中央的一个小村庄，平常敌人“扫荡”不到。这

里，房屋街道挤的像蜂窠，一条条的小胡同，窄得两个人不能并肩行走，来往相遇，只能侧身让过。一家家的小院落，飘着各色各样的破布门帘。满街鸭子跑，到处苇花飞。

《采蒲台的苇》：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来的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会成为冀中的名胜。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没到过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有多么高。一到秋后霜降，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捆成捆，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垛起来，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白茫茫一片。

这些作品之所以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乃是因为它们诗意图地描写了白洋淀的独特风物，最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最真实地描写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情绪和生活，最真实地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情感。这几个方面的自然融合，营造出一种充满诗意的美的艺术境界，使这些作品产生了一种激荡人心的强大而持久的艺术魅力。

《琴和箫》孙犁著，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本书是孙犁描写白洋淀生活的作品专集，其中代表作《琴和箫》写的是一个革命的音乐之家——钱智修夫妇和女儿大菱、小菱在抗日中英勇牺牲的故事。重点是写俩女孩子，文字饱含情感，极为精练传神，读来悲壮凄怆，催人泪下。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创始人、代表人。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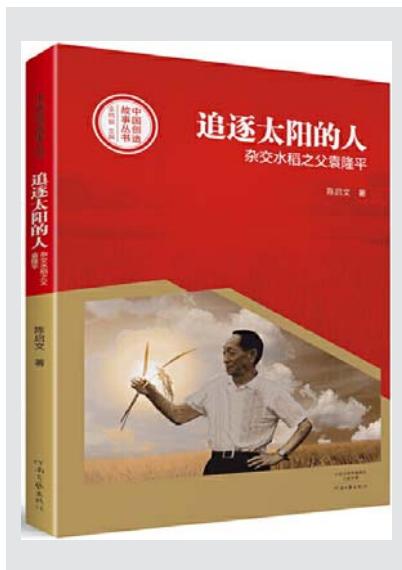
◎ 刘学正（山东聊城）

“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这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获授“共和国勋章”的颁奖词。寥寥数语，高度凝练了这位中国最著名“农民”的丰功伟绩。深切缅怀袁隆平

先生之际，翻阅作家陈启文的《追逐太阳的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书，在衰老坚定的抉择、坚韧的毅力、感人的故事中，能更深入地了解到其为国为民的传奇人生。

这是一部严谨客观、饱含深情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陈启文把袁隆平置于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大背景下，用朴素凝重的笔触，把他那颗“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初心，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全书由“少年意气”“袁隆平的梦”“追逐太阳的人”“第五大发明”“第二次绿色革命”等章节组成，从人生、科研、精神等维度入手，真实还原了袁隆平的生活及科学探索的每个关键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刚满二十岁的袁隆平，背着行囊走进了位于



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读农艺系。此前，从不干涉孩子想法的母亲，曾特地提醒他“学农很苦，当农民要下田干活，中国上下五千年，最不缺的就是农民，最苦最累的就是农活。”可袁隆平已然打定了主意，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长在旧社会，袁隆平目睹了太多的饥民饿死街头，他觉得农业是造福人类的最直接方式，只有把庄稼种好了，多打粮食，才能让天下苍生吃饱肚子。此后，袁隆平从相辉学院转入西南农学院，成为了著名水稻专家管相桓的嫡传弟子。

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饥荒岁月，让袁隆平痛心疾首，“连种田的人都吃不饱，我们学农出身的人能说没有责任吗？”袁隆平认为，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天职。当时，有个老农恳切地对他说：“你是搞育种的，要是能培育一个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新品种，种一亩地相当于种了两亩，该多好啊！”袁隆平心里怦然一动，他一辈子再也没忘记这句话。水稻，良种！这两个关键词加在一起，让他知道自己这辈子该干什么了。

多年的育种经历，让袁隆平遭遇了山洪、地震、台风等恶劣环境。1970 年 1 月 5 日凌晨，滇南突发大地震，袁隆平和助手光着膀子从屋里冲出来，可还没站稳，又钻进了摇摇晃晃的房子。屋里面有他们的种子，那可是命根子！“刚才睡过的几张床被掉下来的砖瓦压垮了……幸运的是，装着种子的铁皮桶还在，一只铁皮桶被震翻了，水泼了一地，但种子只泼出来了一小半。袁隆平扑上去，以最快的速度把种子弄进桶里，又喊了一声‘快走’，一个人提上一只桶奔了出去。”那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在屋前守着种子，听震裂的石头在山坡上翻滚，一直待到天明。接下来的三个月，余震不断，袁隆平白天搞试验，晚上就睡在草席上。

种种艰辛后的成功故事，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多年来，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队接连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超级稻亩产量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2020 年 11 月份，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了 1500 公斤！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1700 万公顷，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一半，仅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可养活 7000 万人。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为了这个朴实的梦想，袁隆平在泥泞的





田地里一走就是几十年，用粗糙的双手为人类捧出了绿色希望和金色收获。斯人虽逝，风范长存。袁隆平的家国情怀，融于每一粒稻米之中，“一日三餐，米香弥漫，饱食者当常忆袁公”。



袁隆平

《追逐太阳的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陈启文著，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为了这质朴的理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始终奋战在农业科研一线，为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饥饿带来绿色的希望和金色的收获，为解决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本书叙述了袁隆平先生研发杂交水稻的科学探索之路，也叙述了袁隆平近九十年来的人生经历，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讲述了袁隆平研发杂交水稻的一系列科学实验活动，将他的科研与生活世界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公书林琐闻（续二十六）

◎ 王子舟（北京大学）

编者按：1899年，M. E. 韦棣华来到中国，于1903年在武昌昙华林文华学校筹办阅览室，开展多种图书宣传活动。1910年，扩大馆舍，命名为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附设于文华大学。该馆向社会开放，学校师生可借阅图书，社会人士亦可利用，对推动中国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教育曾产生积极影响。取名公书林即深寓“公之于众”而非为文华独有之意，公书林也成为图书馆的代名词。北京大学王子舟教授多年研究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辑录公书林之琐闻逸事，本刊特邀其文，将不定期刊出。

一〇五、北京早期开放的私人图书馆——共读楼

国英（1823—1884），字鼎臣，满族索绰络氏，曾任广西、江西、浙江按察使等。光绪二年（1876），他在北京崇文门内东观音寺胡同自家索绰络氏宗祠之东建藏书楼五楹，坐北向南，上下两层，取名“共读楼”。国英自谓：“颜曰‘共读’，其所以不自秘者。诚念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成己成人无二道也。”^[1]光绪六年（1880）国英刊印了《共读楼书目》两





册，巾箱本，登记藏书三千余种、两万余卷，碑帖四百多册。共读楼自光绪七年（1881）三月起，除腊、正两月外，每月逢3、8日已正（10时）至申正（16时）对外开放^[2]。楼上藏书，楼下阅览。楼下一次容纳20名读者。因其东邻贡院，到春会试、秋乡试之时，各地士子搭“公车”前来，分散租住贡院附近的胡同里，如鲤鱼胡同、笔管胡同、方巾巷、官帽胡同等^[3]，方圆一公里内人气旺盛，十分热闹。此时共读楼特向赶考举子连日开放。民国时期，北平东观音寺胡同路北8-11号索绰络氏宗祠尚有楼堂亭阁百余间。“文革”时期，共读楼楼亦在，由东城区某房管所接管。后北京“计划建筑国际饭店期间又归施工队作为指挥部，而大厦像个白无常似地遥遥与南面的北京火车站对峙时，共读楼也就片瓦无存地没于野草荒烟中了。”^[4]

一〇六、江浙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

光绪二十八年（1902），浙江乡绅徐树兰（1837—1902）于绍兴城西鲤鱼桥附近的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耗银三万二千九百余两，参考东西方图书馆经验，纠工建成“古越藏书楼”。书楼共四进，三进是楼屋，供藏书用。一进为阅览大厅，可容六十人看书。各进之间由天井间隔，以利采光。徐树兰将家藏和新购图书总七万余卷全部捐入藏书楼，

以备士子观览，
又拟置产取息
以为常年经费。
图书分类不循
四库方法而分
为“古籍”和
“今籍”。“古籍”
容纳四库书籍，
“今籍”则收中
外东西新书、图



古越藏书楼

画、学报、日报，甚至包括数理化学器械及动、植、矿各种标本^[5]。该年6月，徐树兰拟定《古越藏书楼章程》不久因病去世。其次子徐尔谷、长子徐元钊等继承父志于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向公众开放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树兰家校书四年，迨及书楼建成，专写对联一副赞曰：“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6]。钱玄同曾在古越藏书楼闭户读书数年，后被徐元钊看中，遂介绍女儿徐娟贞许配钱玄同（物理学家钱三强即为玄同、娟贞三子）。后因政局不稳，古越藏书楼时办时停。1932年经教育部批准，古越藏书楼改组为县立图书馆（即今绍兴图书馆前身）。

一〇七、姚文栋创办上海最早的公共图书馆

姚文栋（1852—1929）上海人，字子梁，别号东木，好藏书。曾出使德日俄法等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辞去山西农工总局兼农林学堂督办事回籍省亲，在本邑担任江苏学务公所议绅及上海总工程局议员。鉴于上海未设图书馆，因与城内关帝庙主持僧商议，就关帝庙隙地新建图书馆，名为松江属七邑图书馆。时上海属于江苏辖制，姚文栋一面呈请江苏提学使司申详立案，一面请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分咨各省督抚，饬取所刻官书各一分到馆。其呈文略曰：“当今之世，竞言教育。教育之发达，本于图书。今凡拘守旧学者，或迂阔而不适于用，而醉心欧化者，又放诞而不轨于经。自非以旧道德为基，以智识为辅，则虚张教育为名，适踏畔离之实，人心风俗，贻害良深。世界各国进化之公理，必先保存国粹，而后输进文明。”这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正是当时最髦之论，因此大为两江总督端方所嘉许。端方说：“江苏全省至今没有人办图书馆，上海竟独得风气之先。”便把名称改为江苏第一图书馆，并手提匾额为赠。1907年馆舍落成，正式宣告成立。至革命军兴，馆舍为军队驻留，藏书散失无存。后来苏州邹福保、褚成博等所办的学古社迁到上海，即拨图书馆旧址为会所。二次革命后，馆舍残破，图书的痕迹也毁灭了^[7]。





一〇八、两江总督端方奏请在江宁省城创建图书馆

光绪三十一年（1905），晚清出使五大臣之一端方（1861—1911）到外国考察，见欧美名都巨埠皆有官办图书馆，辉丽闳博，藏书甚富，每日读书者甚众，不禁叹为巨观。回国次年，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他上奏朝廷准其在省城设立官办图书馆。端方在《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宁省城创建图书馆折》中言：“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各国导民善法四端，奏恳次第举办，而以建筑图书馆为善法之首。”他说，虽然中国藏书历史悠久，然“大抵珍储天府，至于郡县图书，罕闻官立。”“江宁为省会重地，自经粤匪之乱，官府以逮缙绅之家藏书荡然。承学之士将欲研求国粹，扬扢古今，辄苦无所藉手。爰建议于城内创立图书馆。”^[8]端方专请著名学者缪荃孙为图书馆总办，于城北建造图书馆，落成后命名为“江南图书馆”。中国最早的几个官办公共图书馆的草创，如长沙的湖南图书馆（1904年）、武汉的湖北省图书馆（1904年）、北京的京师图书馆（1909年）的成立，端方也因职务关系出力甚多。故中国古代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过渡的进程中，端方可谓起了重要推手的作用。



江南图书馆

参考文献：

- [1] 国英. 共读楼书目 [M]. 索绰络氏家塾藏版. 光绪庚辰年(1880), 上册, 自序.
- [2] 国英. 共读楼书目 [M]. 索绰络氏家塾藏版. 光绪庚辰年(1880), 下册, 条规.
- [3] 邓云乡. 贡院小史 [M] //旧京散记.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3-5.
- [4] 吴晓铃. 梦忆共读楼 [M] //吴晓铃集(第四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156-157.
- [5] 徐树兰. 古越藏书楼章程 [M] //《从古越藏书楼到绍兴图书馆》编审委员会, 编. 从古越藏书楼到绍兴图书馆.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180-186.
- [6] 徐明浩. 古越藏书楼创办人徐树兰先生 [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绍兴文史资料: 第三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48-59.
- [7] 陈乃乾. 陈乃乾文集 [M]. 虞坤林, 整理.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上册, 151-152.
- [8] 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宁省城创建图书馆折 [N]. 政治官报, 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二十五日, 353号: 13-14.





百年辉煌 以阅读献礼

——第九届武汉大学读书节

武汉大学读书节起始于 2013 年，以“世界读书日”为中心展开活动，每年 4 月 23 日开幕，每届为期约两个月。2021 年第九届武汉大学读书节以建党 100 周年纪念和“通·读”为主题，通过讲座、分享会、知识竞赛、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为读者们呈上一场接一场的文化盛宴，展现通识教育的魅力，献礼建党 100 周年。

读书节开幕式

“珞珈红脉、周公故居，伟人的红色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珞珈人……”4 月 23 日，在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武汉大学图书馆馆员杨红梅，武汉大学退休教授肖兵及青年学生饱含深情的党史诵读表演中，第九届武汉大学读书节拉开帷幕。



开幕式由武汉大学图书馆、武昌区委宣传部、武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武昌区珞珈山街党工委共同主办。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党委研工部、团委等职能部门，武昌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等单位负责人，武大青年学生、珞珈山街干部、图书馆干部职工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回顾了2020年图书馆在书香战“疫”、繁荣校园文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年度阅读报告，并介绍了第九届武汉大学读书节的主要内容。他表示，图书馆将继续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积极开拓“三全育人”新局面，将图书馆打造成学校的文化教育中心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基地。

武汉大学副校长吴平在致辞中介绍了世界读书日的由来及其主旨宣言，她指出阅读可以丰富人生阅历，图书馆每年都举办读书节的意义不仅是激励大家多多走进图书馆，更好地利用图书馆，更在于让阅读成为师生们的一种习惯，希望大家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在阅读中体验别样的人生。

开幕式上为“书香学院”“借阅之星”“聚焦阅读主题摄影大赛”等各类引领阅读、推广阅读的师生读者颁奖。国学院以人均借阅38.6册当选为2020年“十大书香学院”榜首，国学院本科生郗方园和城市设计学院本科生王芷昕分别以年借阅325册和248册荣登2020“十大借阅之星”文、理工科榜首。郗方园作为借阅之星代表发言，她说，阅读是一场满足好奇心与求知欲的精神之旅，她尤其偏爱纸质书阅读，希望大家都能像她一样在图书馆遇见更好的自己。

图书馆“书香大使”活动2020年入选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创新案例奖前十名，水利水电学院本科生关晓玉作为“书香大使”代表，分享了他的书香假期。他先后两次组队，和小朋友们一起读绘本、讲故事，用书籍为孩子们开启阅读的大门，给孩子们的童年添上一笔浓彩。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武汉大学图书馆新版网站。网站采用自适应、响应式页面布局，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内容和更便捷的使用入口，全力提升服务功能，优化读者阅读体验。





尤传明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当前学校正处在“双一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师生读者、教学科研对图书馆创新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期望与要求，图书馆将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在武昌区和社区的积极帮助下，在各院系培养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师生读者的有力推动下，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在更高起点与水平上举办读书节，为服务师生，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书目图文展与主题书展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宣传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图书馆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书目图文展与主题书展”，与广大读者一起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在阅读优秀书籍中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展览涵括中国共产党党史、几代领导人的经典著作及传记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革命经典文学作品等。展览在总馆与工学、信息科学、医学三个分馆同步展出，吸引不少读者驻足观览并借阅展出书籍。



现场书画笔会 百岁名家挥毫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书画艺术，4月23日，在第九届武汉大学读书节开幕当天，图书馆举办了“书写经典 传承文明”现场书画笔会，活动特别邀请到知名书画家、百岁老人彭祖华教授与书法家李小斌莅临现场摩拳濡墨，挥毫共书，为大家呈现了大小各异、风格不同的多幅优质作品，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也为丰富校园文化、陶冶师生艺术情操发挥了积极作用。图书馆将对笔会作品进行分编珍藏与装裱展示。



第一届武汉大学“知海珞珈”通识大赛

4月23日晚，第一届武汉大学“知海珞珈”通识大赛决赛在图书馆总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大赛由武汉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联合主办，17个图书馆合作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团协办。初赛于图书馆微信竞赛平台发布，共有1861位读者参加。复赛首次使用了提交作品代替试卷答题的方式，面对“孔子建了一个微信群”“欧几里得穿越珞珈山”的新颖主题，选手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诗歌、文言文、经济学报告、出院小结……不同体裁、充满想象力的呈现，显示了各学科各专业的优





势，最终产生了晋级决赛的 24 名选手。决赛当晚的四个环节分别为“两两 PK 赛、魔幻翻转赛、CP 帮帮赛、六强争霸赛”。最后，来自法学院的崔乐获得了特等奖。



“通·读”系列真人图书馆活动

由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学生社团阅微书社和通识教育协会协办的“通·读”品牌在读书节期间推出了多期真人图书馆活动，邀请学校通识课程主讲教师，与同学们进行跨文化、跨语境、跨学科的阅读和交流。

“通·读”第三期真人图书馆以“武大的美不止樱花一种”为主题，邀请了《西方美术鉴赏》主讲阮晴老师、《世界桥梁建筑艺术赏析》万臻老师、《审美教育书简》主讲陈溪老师，与读者们共度了一个“美”的夜晚。主旨演讲中，阮晴以“视听嗅味触——身体五感”切入，一一讲述如何感受生活之美；万臻从希腊里翁·安提里翁桥开始，带领读者们展开了一段奇妙的、关于桥的旅行；而陈溪通过文学作品的“审美话语含蕴”阐述了“美的启蒙”这个哲学和文化主题。

“通·读”第四期真人图书馆以“他们是让你在武大安心的人”

为主题，邀请了《性与健康》主讲朱俊勇老师、《疫苗与健康》主讲刘万红老师、《心理学与生活》主讲曲晓艳老师，为同学们解开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困惑。朱俊勇回顾了致力于大学性教育十几年来的心路历程，展开了“性不神秘，性是科学”的主题分享；刘万红结合国内外疫苗研究现状，为同学们带来了“2021年接种新冠疫苗会有安全隐患吗”的演讲；曲晓艳则从“心”出发，告诉同学们如何“走近焦虑，远离焦虑”，做一个有温度有力量的人。



文华讲坛《让经典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月28日下午，图书馆文华讲坛第十八讲在信息科学分馆举办，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余光应邀作了题为《让经典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主题讲座。王教授从何为经典以及为何阅读传统经典等方面阐述了经典阅读的重要现实意义，他认为，阅读经典是文化的传承，是价值的选择，在困惑的时候，这些经典可以给我们以指引。同时，阅读经典还能培养一个人的写作能力和非凡气质，是寻求完善、独立的自我品格的最佳途径。





3、价值的选择

梁启超认为，在我们困惑的时候，这些经典可以给我们以指引。

唐文治的看法：“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新冠疫情系列专题展

医学分馆立足图书馆的独特价值和资源熏陶功能，策划了“精研医学，畅阅人文”主题系列活动，以弘扬“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的医学人文精神。在我校医学生中开展了“我与抗疫”图片征集活动，并从中精选四十余张主题图片，举办了“2020年武大医学生抗击新冠疫情主题图片展”。从馆藏文献中精选出围绕武汉抗疫书写的纪实文献、人类发展历程中的防疫历史文献，以及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病毒研究、新冠肺炎诊治等相关科研文献总计120余种，举办了“新冠疫情中外文专题书展”。力争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群体，从社会到科研，全方位再现疫情期间的人、事、物，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人性光辉，并通过科研文献的集中展示满足医学部读者专业学习之需。



小布志愿服务队“红孩子读书会”活动

4月22日下午，小布志愿服务队的同学们和东湖村社区贝思乐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开启了一场“红孩子读书会”。在通俗易懂的党史知识讲解之后，进入红色绘本阅读环节，《迎春花开》《红孩子》《鸿毛信》……优秀的儿童绘本让小朋友们由书陪伴着走向同祖国的紧密联结，感受到作为中国娃的骄傲和自豪。小朋友们表演了歌舞节目《童心向党》，并亲手制作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活动最后，小布志愿队和东湖社区向小朋友们送出各类绘本和“爱阅读”主题明信片，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图书馆。



此外，读书节期间还举办了红色经典抄书接力、党史知识竞赛、第四届武汉大学中华经典美文诵读大赛、武汉大学第十届书评影评大赛、通读课程线上推介及优秀论文线上展、一期一书、“书香大使”“十大借阅之星”推荐书目展、主题摄影大赛优胜作品展、奇书展、珞珈阅读广场等活动。





将古籍保护好 让文献活起来

——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揭牌

7月9日，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我馆召开，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图书馆及古籍保护单位的近50名代表，就高校古籍保护和特藏文献资源的保护、建设、利用和研究展开交流。本次会议由武汉大学图书馆主办，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华中地区中心协办。

大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尤传明主持，武汉大学副校长吴平，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刘伟成，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方卿先后致辞。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因临时公务安排未获成行，也特地发来了书面贺词。



吴平代表学校对关心、支持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成立的相关单位与领导专家表示诚挚感谢。她指出，中心成立是落实提升古籍保护水平，切实发挥古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一项重要举措。她介绍，武汉大学历来有重视古籍保护和文献资源建设的优良传统，重视版

本目录研究，图书馆也积极发挥古籍资源优势与业务特长为师生教学科研提供实践实习平台。她希望，中心成立之后能不负厚望，统筹指导全校古籍收藏与资源建设，集中修复校内破损古籍文献，加强传统文化与审美通识教育与相关学科建设，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古籍保护人才，全面推进古籍相关的高水平学术研究，在古籍工作领域发挥应有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刘伟成对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指出，武汉大学图书馆作为湖北重要的古籍保护单位之一，具有良好的古籍保护传统，馆藏古籍数量品质兼善，相信中心的揭牌成立和发展定会在全省、全国的古籍保护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表示，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将加强与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的合作，推动全省古籍保护事业再上新台阶。

方卿认为，中心的成立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举措，有利于武汉大学古籍收藏的保护、开发及研究，通过中心的资源整合与力量凝聚，将推动学校相关学科的发展。

张志清在贺信中对中心的揭牌成立表示祝贺，认为这是武汉大学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重要举措，对武汉大学领导的高瞻远瞩表示敬佩和感谢。他讲述了武汉大学图书馆自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图书室时期就一直延续的博采旁收、求新求实的藏书特色，并指出武汉大学培养了大批图书馆所需人才，为全国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表示，古籍保护是传承文脉、守护精神家园的伟大事业，希望武汉大学呵护培育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的成长，也希望全国古籍工作者关心支持中心的发展，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愿为中心的建设和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对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的成立缘起、现有成绩和发展规划。

在热烈的掌声中，吴平、刘伟成、方卿、王新才以及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共同为中心揭牌，“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





揭牌仪式后召开了古籍保护学术研讨会，共有 6 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副主任、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刘万国，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副主任、郑州大学周易与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崔波主持。

陈建龙阐述了“图书馆古籍保护研究的几个学术问题”。他从厘清馆藏历史、丰富理论概念、探索古籍保护的形式、功能与应用等几个方面，强调古籍保护事业应探索对古籍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并期待通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建设与发展古籍保护事业的未来道路。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探讨了“文化传承视域下的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他阐述了对古籍进行传承性保护的重要性，指出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必须以文化传承为根本目的，要让古籍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并落实到日常的行动中，才能搭建起科学而完美的古籍保护学科大厦，培养出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富于历史使命感的古籍保护人才。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党跃武分享了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中的探索经验。他指出，特色资源是体现高校图书馆文化育人、文献育人功能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工作应该打造特色资源，加强修复保护，实施珍本再造，挖掘文化内涵，并加强宣传推广。

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史梅介绍了南京大学馆藏古籍的整理历史和现阶段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包含打造古籍阅览室和修复室、推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整理未编古籍，打通图书馆与博物馆资源，进行文化推广与传播等。她表示，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的中心地位，守护典籍、弘扬优秀文化，是图书馆员的责任和义务。

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王蕾交流了“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与数字人文研究”，她论述了民间历史文献的发展、存藏现状与研究意义，介绍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对馆藏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编目和修复工作，以及数字人文在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方面的创新性运用。

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汪帆从如何规范地拍摄书影、如何详细记录染色实验数据和自己多年在全国各造纸地走访学习的经验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心得体会。回顾工作历程，汪老师感慨万分：“心中有理想，眼里有光芒。”

主题发言后，与会人员分管理组、业务组进行了研讨，大家围绕着特藏建设、人才队伍、古籍保护与整理研究等主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交流。





闭幕式由教育部高校工委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原馆长陈进主持，各组分别汇报了讨论情况，大家碰撞思想，交流共识，为共同做好古籍保护工作开拓了新思路。

王新才作大会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会议紧凑高效、气氛热烈，与会代表们对古籍的保护、修复、研究和利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阐述，主题发言与交流研讨异彩纷呈、金句迭出。他再次对参加会议的各位学者专家表示感谢，也希冀全国古籍保护单位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推动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还实地参观了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对其丰富资源和先进设备表示赞赏。



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位于武汉大学图书馆总馆 D2、D3 楼层，总面积 1800 余平米，下辖三个古籍书库、一个民国书库、一个西文古籍书库，设有古籍阅览区、古籍编目与数字化工作室、古籍整理与研究室、文献修复中心四个专业工作区。现藏有线装古籍 20 余万册，善本 800 余种 1.4 万册，其中有 300 多种古籍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 66 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心将牵头全校古籍保护、文献修复及整理研究工作，以提升全校古籍特藏文献保障、服务与研究水平。

传承经典 存亡继绝

——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与研究成果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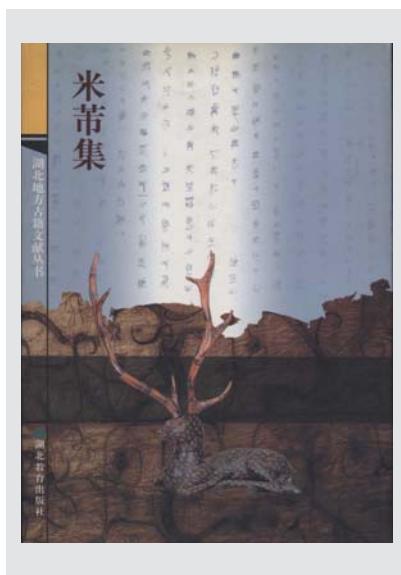
◎ 谢 泉(图书馆) 整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代典籍浩如烟海，然而因历史久远，语言文字变迁，许多古籍已难以识读和理解，必须通过审定、校勘、注释、翻译等整理工作，才能使之符合今人的阅读习惯。古籍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使古籍走向生活，让历史照进现实，它是古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之一。

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起步较早，1963年就编印出《武汉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1982年又对其进行了修订。20世纪80、90年代，图书馆完成了对馆藏古籍的卡片式目录编订工作，为之后的古籍整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2年，黄正雨、王心裁辑校的《米芾集》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之一种，为国家古籍整理“九五”规划项目，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书中对米芾诗、文、词均有精选收录，并附《米芾研究资料集》，对研究米芾的文学及书法成就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2005年，李玉安、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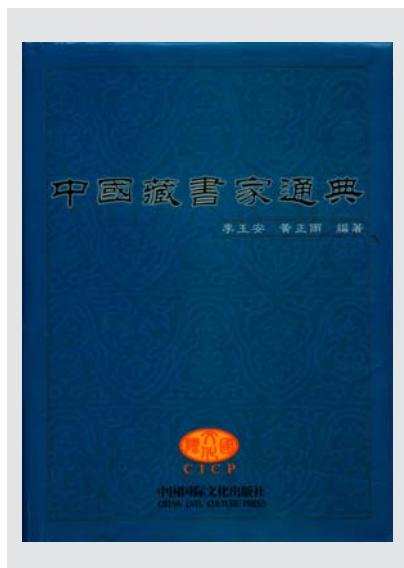
正雨编著的《中国藏书家通典》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录历代典藏官员、目录学者、私人藏书家、著名书贾、藏书文化研究者等各类藏书人物的生平小传，共2400余则，是研究中国古代藏书史的重要工具书。

2010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荣开始主持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对馆藏特色古籍进行审定、校勘、辨析、汇编，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挖掘其内在价值。周荣为本馆研究馆员，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经过数年努力，在馆领导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古籍保护中心团队已编纂出版了《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图录》《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卷》《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汇编》等多部书籍，另有一批论文在相关专业期刊上发表。以下是近几年来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图录》

王新才、楚龙强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本书精选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古籍166部，详细揭示书名卷数、著者、刻抄印信息、行款等内容，并配之以高清书影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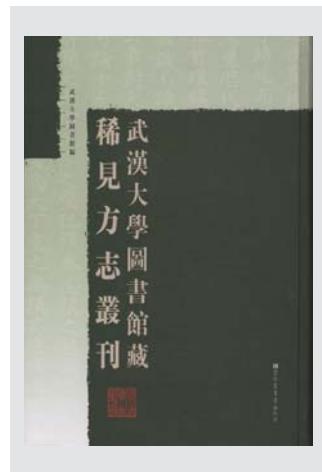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新才、楚龙强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本书收录了武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十种方志，其中不乏孤本，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卷》

(“十二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新才、楚龙强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本书收录了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古籍二十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囊括《易经正讹》《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筹海图编》《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陈伯玉文集》《文山先生文集》等珍善书籍，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汇编》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明清以来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的中期成果之一)





周荣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本书收录收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 108 种,涉及哲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各个门类,也收录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讲义,如水利科学、地质学与生物学等,主要作者有谭戒甫、范寿康、周鲠生、刘秉麟、游国恩、黄侃、钱南扬、方壮猷等。这批珍

贵的讲义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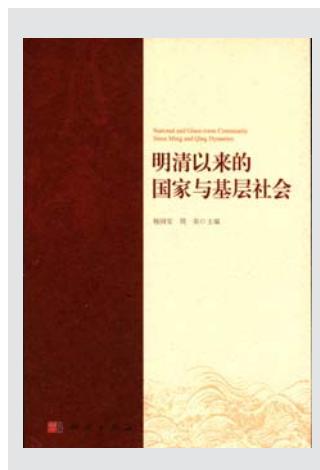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

王新才、尤传明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本书收录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 1912 年以前古籍书目资料 8033 条,著录普查编号、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存卷等多项资讯。书后还编制有书名笔划索引,以方便读者查询使用。



古籍保护团队的成员们,还利用业余时间,对馆藏古籍进行多纬度、深层次的研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兹罗列于下:



《明清以来的国家与基层社会》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项目)

杨国安、周荣主编，科学出版
社，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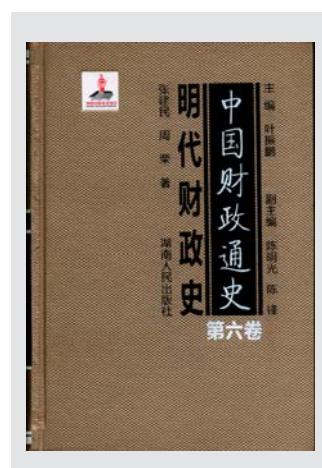
本书以明清以来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注重将文
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多层面、
多角度揭示了传统时代的国家与基
层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丰富
内涵。

《中国财政通史·明代财政史》

(财政部“中国财政通史工程”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第
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张建民、周荣著，湖南人民出
版社，2013

本书是财政部“中国财政通史
工程”的第六卷，是国内少有的明
代财政史断代之作，较为全面地梳
理了明代财政管理制度、中央财政
管理机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论
述了财政制度在基层执行的具体情
形，如明代鱼鳞图册的编造、政治
中心北移与明代漕运、永乐以来对
漕运河道的整治等。





《民国国学文库：陆游诗》

王新才校订，崇文书局，2014

本书据黄逸之选注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的诗作加以校订，是读者了解陆游及宋代诗歌的国学入门基础读物。



《民国国学文库：老子·庄子》

黄正雨校订，崇文书局，2014

本书由陈柱、沈德鸿选注，黄正雨校订，是读者了解道家经典的国学入门基础读物。



《民国国学文库：李后主词·苏辛词·周姜词》

戴蔚校订，崇文书局，2014

本书据叶圣陶等学界翘楚选取李煜、苏轼、辛弃疾、周邦彦、姜夔的著名词作，加以注释，是读者品读经典的国学入门基础读物。

《中国图书散佚史》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助研究项目成果，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出版项目)

李玉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本书从通史的角度，挖掘历代图书的散亡故实，研究图书的存亡规律，旨在探索中华文明的传承和演绎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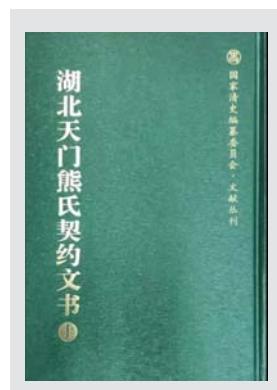
《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

(国家清史工程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间文书与基层社会变迁”结项成果)

周荣参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本书完整收入了清代、民国时期湖北天门熊氏大地主兼商人家族，自清康熙十年(1671)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近二百七十年间，有关社会经济往来的契约文书1778件，内容涉及土地买卖、租佃、典当，以及房产交易、水利灌溉、公益活动、赋税与徭役、商贸往来、借贷等，并加以点校整理、考证注释，

共计约140万字，另有100余幅彩图。



《大冶旧志集成》

吴芹芳副主编，武汉出版社，2014

本书汇集【嘉靖】《大冶县志》、【康熙】《大冶县志》、【同治】《大冶县志》、【光绪】《大冶县志续编》和《大冶县志后编》共五种大冶旧方志，并进行了整理点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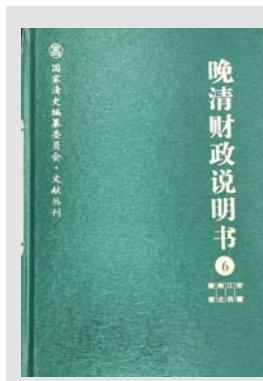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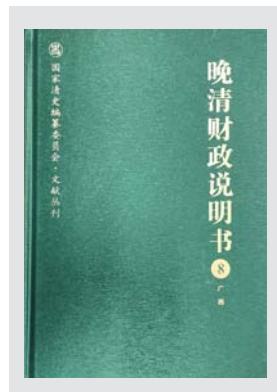


《晚清财政说明书（广西、福建）》

（国家清史工程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王美英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

本书对晚清广西、福建二省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有比较明细的记载。对了解晚清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变化，以及地方财政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诸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晚清财政说明书（湖南、湖北、山东）》

（国家清史工程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周荣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

本书对晚清湖南、湖北、山东三省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有比较明细的记载。对了解晚清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变化，以及地方财政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诸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华大典·地学典·测绘分典》

（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项目）

王美英副主编，周荣、焦露参编，重庆出版社，2015

本书依据现代学科分类，运用传统类书的编纂方法，第一次将我国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丰富测绘历史文献史



料，进行全面搜集和系统整理，旨在为学术界以及希望了解我国测绘学科历史文化和发展状况的人士提供准确翔实、便于检索的珍贵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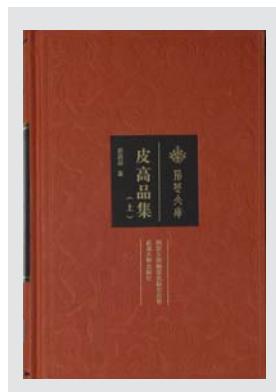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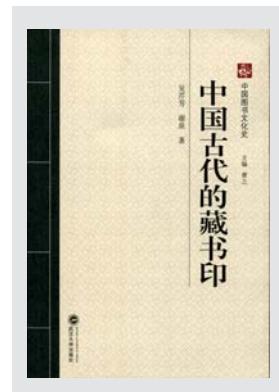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藏书印》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吴芹芳、谢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本书从藏书印的源流、藏书印的种类进行论述，并分别论述官府藏书印、私家藏书印、夫妇藏书印特点，同时对藏书印作伪及如何识别进行了讲解，阐述了藏书印在图书文化史上的特殊价值，对研究古代藏书及藏书印的人士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皮高品集》

(荆楚文库民国文献编)

周荣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本书收录皮高品先生 1949 年前的著述，包括《中国十进位分类法及索引》和两篇论文：《经书分类的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书籍分类的研究》。《中国十进位分类法及索引》是一部根据中国学术特点而编成的目录学著作，也被后世

称为“皮氏分类法”。本书完整地展示出皮高品先生 1949 年前对图书馆学研究的思想，对后世研究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大有裨益。

《中国阅读通史·清代卷（下）》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王美英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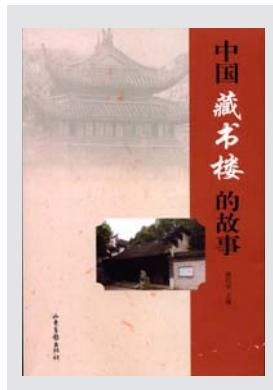


本书全面探讨了晚清阅读生活，勾勒出晚清阅读的社会背景、群体、场所、内容、方法、影响和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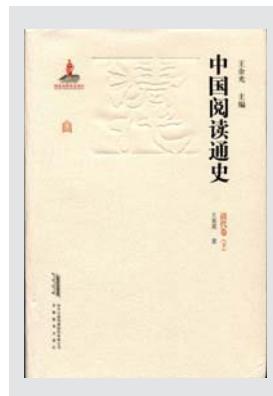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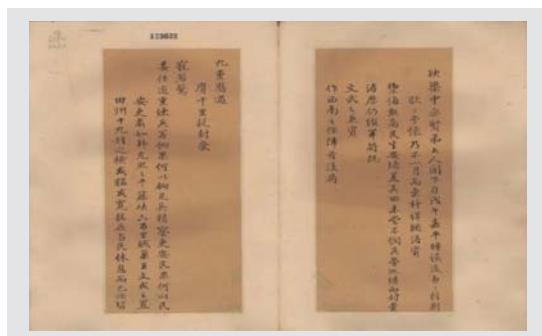
《中国藏书楼的故事》

谢灼华、黄正雨、吴芹芳、谢泉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

本书回顾中国古代官私藏书楼的演变历程，剖析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责任、作用、影响，同时叙述读书人在知识海洋中遨游的苦乐与藏书人积累、保存图书的艰辛，以及在藏书楼中发生过的那些有趣的事。



业冷门“绝学”学科建设，助力中华经典阅读推广，发挥高等学 校育人职能。



另有《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晚清名臣手札》已整理完毕，交付出版社，计划近期出版。

上述古籍整理与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特色历史文献资源，同时也为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支撑。未来，整理与研究仍将是武汉大学古籍工作的重点之一，相信会有更多的成果面世，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涉古专业建设，助力中华经典阅读推广，发挥高等学 校育人职能。

清华才女们的“古月堂”及其“静斋”

当你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寻寻觅觅时，与“工字厅”一巷相隔的这个四合院——“古月堂”，可不能漏眼了。此堂建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建筑面积约有670平方米，原是园主人但凡掌灯读书，即有红袖燃香的开卷清修之地。1925年8月，28岁的朱自清应聘到清华任大学部国文教授。他在清华园里的第一站，就是在“古月堂”里的第六号教师宿舍。



古月堂



1928年清华园内第一批入校女生

三年后，该校被国民政府批准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担任校长。在学生会的强力推动下，当年10月，清华招收了第一批中学女生入读本科。当时大学部已有三个年级，因而这批新入学的女生被顺序称为“第四级”。此有《四级级歌》为证：“春来大地兮遍紫黄，共坐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吾级始创，始创，始创，吾级之光。”首批女生有吴靖等11人，另有宋丽环等4位“第三级”的转学生。校方遂以古月堂为入学女生的休憩之所，汪健君有诗记之曰：“古月堂前几变更，昔年济济聚群英。一从女禁开黉舍，两度繁花共月明。”

1933年，校方专门为女生们建造的“静斋”，落成于古月堂的西侧，占地面积达到2100多平方米。她位于“荷塘月色”东岸，是一幢面对着苍翠的小土山，隐约于绿树林之中的三层板式“红楼”。当年秋季一开学，第8级的莘莘们，便从散住在古月堂、西北院和新南院18号的女生宿舍，一起兴冲冲地集聚到了静斋。

女生们集居在“静斋”，大概最受男生们欢迎的，该是郑秀笔下的那个“会客厅”了：“静斋北侧朝东约三十平方米一间长方形的客厅，为女生宿舍所独有……《舍规》规定除周末和星期天会客时间较长外，平日只在中午及晚自习后、熄灯前可会客，在校男、女同学均能自觉遵守，无大声谈笑、喧哗或逾时久留的现象发生。”

基于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清华大学的女生们在1993年开始，提前一天过起了极为校园民间化的“清华女生节”。从此，在每年的3月7日，校园里总是弥漫着柔和的女性人文气息，似乎提示着在校女生们，应倍加明晰自己的性别，确认自己的社会角色，做一个心智成熟的“才女”。更为可贵的是，每当此日，总会有若干杰出的女校友返校，向在校师妹们分享自己当年的学业、现在的职业经验，以及似乎不可向男生透露的女性人生智慧。

（秋禾）

文华书潮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指定书香园地
本刊系公益性文化刊物，免费交流赠阅



主 编：王新才 尤传明

执行主编：黄 鹏

编 辑：周燕妮 杨 蕾

封面设计：张珈利 朱 丹

本刊邮箱：guankan@lib.whu.edu.cn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

邮政编码：430072

封面照片：龙泉

